 落后贫穷、疾病肆虐是非洲给世人的普遍印象，媒体对非洲作出一系列的负面报导，如海盗猖獗、政变动乱等，更令人们望而却步。只是，在许多华人的眼中，他们看到的除了险境之外，还有遍地的钻石与黄金。

       环视全球，论发展空间和投资潜能，非洲是硕果仅存的处女大陆。那里天然资源丰富、市场庞大，物资却匮乏，因此中国一经改革开放，许多嗅觉敏锐的中国人便远洋而来，在这片商机处处的大陆开拓事业。他们许多已经飞黄腾达，并成功建立起自己的商业王国。

       早在18世纪，已有华人越洋来到一些非洲东部和南部的国家，如南非、毛里求斯、留尼汪等，有的是契约华工，有的是自由移民。契约华工或在农园栽植甘蔗、棉花及咖啡等经济作物；或修筑铁路、公路；或开采金矿。自由移民则大多从商，有的在城镇经营零售业，有的深入穷乡僻壤，收购当地土产，再转售给商行。一些华人在这些国家已繁衍了四五代，虽与当地人的黝黑肤色格格不入，但他们其实早已融入当地社会，与当地人和睦共处。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批来自港台的投资移民相继涌入；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陆移民浪潮一波接一波，使非洲的华人人口激增。

       如今，华人遍布在非洲国家的各个角落，人数多者如南非，有30多万华人；资源丰富的国家，如苏丹、尼日利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也有数万华人。新老华人涉足零售、饮食、贸易、制造和建设工程等领域，为非洲的经济发展奠下坚实基础。

       中国人把各种有“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带到非洲来，由于价廉物美，正好纾解当地物资匮乏之窘境。华人不惧艰险、刻苦耐劳的精神是当地人所缺乏的，而华人也把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非洲。劳动力就像是华人为非洲浇洒的甘霖，滋润着这一片土地。也正因为华人不吝于与当地人分享技术和科技，让非洲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获得提升。

       随着中国的崛起，非洲华人逐渐扮演起桥梁的角色。近十年来，无论是个体户或国、私营企业，华人一方面在此开创事业、拓展业务，另一方面又在中国与非洲的商贸合作方面起到促进作用。如今，双边合作更加频密，每年贸易额都大幅增长，让中非两地的人民尝到双赢的果实。

       华人的到来，也意味着中华文化的传播。中非关系密切，非洲人逐渐对中华文化产生兴趣，进而掀起学习中文的热潮，各类汉语教育中心和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般设立。

       总体而言，非洲华人普遍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和尊重，颇有一种“人上人”的自豪感和文化优越感。尽管华人在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生活都过得枯燥寂寥，但也有不少华人享受这种闲淡舒适的生活；清新的空气、温暖的气候，都让华人深深地爱上这片土地。目前已入籍或愿意留在非洲的华人还算少数，但倘若他日非洲真正发展起来，处处都是商机，华人或许就会萌生“长厢厮守”的想法。

南非是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国家，东临印度洋，西濒大西洋，有着“西方海上生命线”之称。其民族特色多样化，享有“彩虹国度”的美誉。

       南非经济在非洲国家中一枝独秀。丰富的黄金、钻石以及各种稀有矿物，为当地经济奠定了十足的底气；再凭着先进管理及廉价的劳动力，成为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火车头”。

       当地的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无边无际的草原、千百种奇珍异兽、幽静美丽的港湾、清新宜人的气候……如此美丽的国家，遍地充满商机，吸引着无数华人不远千里前来追梦。

 2002年，在开普敦（Cape Town）展出的一幅由中国人于1389年绘制的非洲大陆最古老的地图——《大明混一图》，清晰地标出了好望角的位置，这可能是华人最早到达非洲的证据。

       到了15世纪，一名威尼斯籍的地图制作师弗拉·毛罗（Fra Mauro）发现了一艘中国船只在好望角周围勘察南大西洋海域，于是便将此情景载入了他世界地图的附录之中。

       1660年，一名叫万寿的华人囚犯被荷兰殖民政府从巴达维亚（即今日的印尼雅加达）流放到开普敦，而他极有可能就是早年登陆南非的华人。

       在18世纪末，南非的华人只有100人，他们之中有小部分人在好望角的中国餐馆售卖蔬菜，其余的大多数是印尼（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奴隶或服刑期满后的犯人。

       到了19世纪70、80年代，尤其是在1886年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附近的金矿被发现之后，抵达南非的华人一般都是冲着淘金梦而来的。当时甚至有一些华人还将约翰内斯堡的新金矿误认为是美国的旧金山。但是到了南非之后，华工们才发现这里并非原先所想象的“金山银山”。

       20世纪初，英殖民统治者颁布了必须要有特许证才可以在南非淘金的规定，但这种特许证只是发给白人。政府还明文规定华人只可以聚居在特定地区里，并且不准在人行道上行走，不能购买烟酒，也不得进白人的戏院、餐厅、酒吧等公共场合，甚至连乘坐公共汽车、电车、火车以及上公共厕都均有严格的区分；华人外出的时候还必须随身携带南非政府所签发的许可证等。

       1907年2月，最后一批契约期满的华工撤离南非，只有305人愿意留下，他们就是目前南非老华人的先驱。

       到了1948年，在南非白人政府推行的种族主义隔离政策下，华人自然也受到歧视。1953年到1963年间，只有28名华人前来南非。

       南非的华人大致上可以分为三大类。

       老一辈的华人，是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来自广东顺德、梅县的老移民及其后裔，这一批华人多数已经再移民他国，目前人数不足一万。他们在南非已衍生了五代，分布于约翰内斯堡、开普敦以及比勒陀利亚等大城市，主要是经营中餐馆和杂货店，其中不少华人还在香港、美加等地也置有产业。

 中年一代的华人，则大多数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以投资或技术移民的身份到南非设厂及经商的港台人士。

       在1967年，台湾与南非开始有了频密的经贸合作。南非政府于是颁布一系列优惠台商前来投资的政策，包括外汇兑换优惠、免税、聘请当地员工的薪金补助等，而唯一的要求就是厂房一定要设在郊外。

       颠峰时期，在南非的台湾人至少有三四万人，台商所设立的工厂数以千计，且购置了不少土地。

       香港人前来南非，则多数是因为1997香港回归期限将至，于纷纷寻找“出路”，家境富裕的大多选择移民欧美，一部分人却移居南非。

1994年，南非改朝换代之后，由于治安不靖，加上中国大陆所生产的廉价商品进军南非，许多台湾人决定撤资回台。至于原本担心香港回归中国之后，局势将有所改变的香港人，因为发现香港在1997年之后一切如故，很多也选择回港发展。如今，留在此地的港台人士大约只剩下一万多人。

       中国大陆新移民是目前南非最庞大的移民群，大约有30万人之多。自从1998年中南建交之后，他们便陆续移居南非，现已成为当地华社的中流砥柱。

开普敦第一代老华人Law Mingsing夫妇。

物换星移，随着南非移民、投资政策的改变，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当地华人剧增；接着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被罢黜，当地政坛已见华人的身影，这意味着华人正逐步融入当地。他们在当地构建了完整的华人社会，有自己的教育中心、商会、媒体与宗教团体等。

       福建同乡会副会长陈赛琴说：“在飞机上鸟瞰，一大片辽阔的草原美丽极了，还未下飞机，我就深深地爱上了这里。”

       大陆新移民的到来，又再度发挥了老华人当年刻苦耐劳的拼劲，并发挥得淋漓尽致。新移民以福建人最多，据称有7万多人。他们涉足各行各业，如饮食、商贸、电子、旅游、建筑、渔业等行业，可以说目前在南非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华人身影的行业。

       “1995至1999年是中国进口贸易和零售生意做得最火红的黄金时代。”经营五金的林先生说。

       这一段时期国际社会对南非的经济制裁结束不久，加上该国新政权刚刚建立，各项规章制度不健全，市场经济又初开放。原本轻工业相当落后的南非，民生用品一直依赖进口，正巧遇上中国的廉价商品，便在低收入消费群中大受欢迎。

 距约翰内斯堡机场约20分钟车程，有一条长600多公尺，名为西罗町的街道（Rollo Street Cyrildene）。这条街于2005年底才被正式注册为唐人街，是全非洲第一条受到官方正式承认的唐人街。

       它类似中国的任何一条街，街道两旁都是中文招牌、广告贴单，这里的生活模式与中国的并无二致。所遇见的都是有着相同肤色、说着共同语言的人。唐人街共有近百家店铺，超市、餐馆、旅馆、书店、网吧、理发店等，除了少数几家是香港、台湾人经营的店铺外，其余都是大陆人经营。

       近年，随着唐人街的华人人数不断增加，西罗町周边地区的房产一直被华人竞相购置，唐人街一直在不断延伸。据估计，目前居住在唐人街地区的华人已达7万人之众，以致于周围房价、租金迅速上涨，自然也带动了该区经济的发展。

       其实，在约翰内斯堡老城的市中心，有一条俗称的“老唐人街”（Commissioner Street）。全长不足200公尺，曾是华人摊点最集中的地方，辉煌时期有过30多家华人商店，其中包括瑞兴行、顺德家私、燕子酒家等老字号。

 矗立在“老唐人街”已达60余年的瑞兴行是华人创业精神的象征，周边许多的华人店铺已经停业或易手转让，但是瑞兴行金漆招牌依旧，印证了老华人守业的执着精神。

       自从黑人执政以后，这里的治安每况愈下，纵然警察总署就在斜对面，华人商家和顾客还是频频遭抢劫，商店往往晚上7点不到就闭门歇业。如今，这里只剩下稀稀落落老华人的身影，以及数栋泛黄的老建筑。

       老华人的人数虽然日渐减少，但已成为了新华人的榜样。他们不但保存了完好的东方传统，且具西方的守法精神。他们培养的孩子，大都是专业人士，有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医生等。“老移民刻苦耐劳，注重教育，他们的儿女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较其他种族高。早在70年代，平均每两个华人就有一辆车。”一名老华人自豪地说。

       近年新移民人数激增，无论新、老唐人街都难以承受洪水般的移民潮。于是从西罗町又延伸出十多家商城，如中国城、百家城、非洲商城、中国商贸城等，雨后春笋般在南非的黄金矿脉上拔地而起。

       每座商贸城都有上百家集批发和零售于一体的商店。从玩具到五金、电器、厨具、眼镜、建材、衣服等包罗万象。据了解，平均每家商店能为3个当地人提供就业机会，也为当地政府解决了部分失业问题，这是商贸城的另一项贡献。

* *在约翰内斯堡老城市中心休布罗商业街百余公尺左右，有一座“上海楼”。这是一栋6层的公寓，自1992至1993年间，因为成了上海新移民的落脚点而得名。在1994年以后，由于上海移民陆续搬离，如今知道这栋楼“来历”的新移民已经不多。*

这里的华人聊天总离不开治安问题。就连问候语也不是一般的“近来怎样？”、“您吃饱了吗？”，而是“今天有被抢吗？”。

       在防范措施方面，华人都费尽心思。如不到危险区去，不独自出门，天黑后不外出，一上车便摇上镜子锁好车门等等。一些华人认为，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枪械泛滥、贫富悬殊，加上没有死刑等，所以治安形势一直未见好转。

       2004年，南非华社在约翰内斯堡成立了华人警民合作中心。该中心是警方与侨民联系的桥梁，主要帮助华人报案，协助警方调查、搜集证据。该中心成立以前，华人每次遭抢都倍感无助，甚至不知道如何报警，现在这些问题都得以解决。

       曾担任过该警民合作中心组长的陈宏印说：“有一次，接听一名华人电话，说他家外有可疑人物，虽电话报警了，但警察很久还没来，我只好驾车到警局，把警察领到他家那边去‘巡逻’。”

       2006年2月，南非首家华人保安公司注册成立，为华人企业提供保安服务，以确保华人经营的商场、餐厅及娱乐场所不受非法侵犯。目前，保安队伍已扩充到100多人的阵容，并配有冲锋枪、霰弹枪等先进武器。该公司还将购买直升机，以在最短时间内抵达案发现场。

       南非华人国会议员陈阡蕙说：“我们都在静观其变，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将会是分水岭，当地政府必然会全力加强治安监管。希望好转的现象在世界杯后延续下去。”

 南非是前英国殖民地，推行英式教育。下一代的母语教育，是南非华社极为关注的事情。

       从首批来淘金的华工，到后来的港台移民，再到90年代以后的大陆移民潮，各阶段来自不同区域的华人移民，皆给南非的华文教育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呈现出多元化特点。

       因早期的华人主要来自中国广东沿海一带，南非华文教育最早是以广东话为媒介语的。随着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大批新移民的到来，各个华侨学校逐渐转变成以普通话教学或广东话与普通话并用的教学方式。

       在约翰内斯堡与比勒陀利亚的交接处，有一所由华人募捐而建成的全日制华侨学校——斐京华侨公学。该校成立于1934年，至今已渡过了70余载。目前该校已被收归为国立学校，教学大纲，授课内容及方式与南非本地学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每个在校生都必须学习华文。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增强，华人对孩子的华文教育极为重视。他们开始聘请华文家庭教师或把子女送进华文补习班去进修华文。

       在西罗町附近的华心中文学校，是由台湾政府出资开设，至今已12年了。目前该校约有200名学生，其中非华裔约占5%。

 学校采取周末上课制，教材有简繁两套，以便来自大陆和台湾的孩子学习；同时还自制一套网上学习的软件，方便学生课后随时随地上网复习。华心中文学校校长暴秋玉说：“学生用这个软件可以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交流，交换学习心得。”

       暴秋玉还透露：“由于缺少学习和使用华文的环境，很多华裔子弟对华文皆不感兴趣。有的甚至将华文当成高中联考的一门语言来报读。无论如何，我们都会继续走下去，因为这是一项传承中华文化的光荣使命。”

       另一方面，新移民则急需提高当地语言能力。

       语言也是南非新老华人显而易见的区别。第一代华人来的时候也曾面对过语言不通的问题，但是，当时华人不多，圈子不大，为了顺应整个大趋势，他们都在短暂的时间内掌握了英语，然后迅速地融入了当地社会。

       现在环境有所改变，约30万的南非华人社会已足以形成自己的生活圈子，尤其是在唐人街生活的新移民，不谙英语也可以如常生活。这就养成了华人的惰性，很多新华人在南非整整十年，却连最基本的英语也不会说。打工的还是打工，当老板的仍然离不开翻译，难以融入当地社会。

       华裔子弟母语水准趋弱，一直是华社心头之忧；而新移民的英文水平低，则成为融入当地生活的最大障碍。

南非华人的文化事业，不仅在教育上树立一面旗帜，而且媒体也一样不遑多让。目前南非拥有华文三报二刊，为当地华人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来源。

       20世纪30年代，南非、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的老华人，在台湾资助下创办了《侨声日报》，这是一份属于华人自己的报纸，报名由蒋介石亲自题字。

       《侨声日报》报道方式多采用台湾“中央社”和港澳通讯社的电讯形式，富有浓郁的台湾色彩。在辉煌时期，曾经定期发行到南非、津巴布韦、纳米比亚、莫桑比克、莱索托、斯威士兰等周边国家。在2005年，这份经历了74个春秋的老报纸，最终因未能适应时代的变迁而宣告终结。

       原《侨声日报》主编冯荣生，于1994年创办了南非第一份民营华文报——《华侨新闻报》。冯荣生吸取了过去办报的经验，《华侨新闻报》是不依附于任何机关或团体的独立媒体。其宗旨是“记载侨社历史，改善移民生活，促进信息交流，弘扬中华文化”，以客观报道当地及侨社新闻为主，从此非洲华文传媒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1999年1月末，就在当时还是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访问南非当天，《南非华人报》正式出版发行，以报导大陆信息和南非侨界信息为主，宣扬中华文化，服务南非华人。为加强中南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报定位在“三华”：即华人办的、给华人看的、用的是华文。发行范围遍布非洲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等国。

       2005年5月，也就是在《侨市日报》关闭不久后，又一份崭新的华文报章——《非洲时报》走进了华人的生活。这份由李新铸、吴少康、陈玉玲共同出资创办的报纸，以促进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为读者们作出客观、公正、准确的报道为宗旨。《非洲时报》每期发行四五千份，除了南非各地，也发行到周边其他国家。

       李新铸说：“创办这份报纸，可以帮助身在非洲的华人及时了解祖国的发展与变化的信息，虽然目前还没有带来任何利润，但意义重大，所以我们会一直办下去。”

       三报鼎立的现状已表明了华人经济在南非发展迅速，相信也是增进中非人民相互了解，相互合作的桥梁。

       2006年8月，南非的华文媒体再次立下一个新的里程碑。侨界首份简体中文杂志——《虹周刊》承载着许多当地华人的厚望而诞生。

       《虹周刊》由南非好望角文广传媒机构出版，它全面细致地向华人尤其是那些外语不好的华人，介绍当地政治、经济、法律政策和社会文化生活，帮助他们了解周边发生的故事。

       接着，《声音》杂志也于2007年由李铿发、刘利国等人创刊出版。这是一本着重定位于文化内容的中文杂志，“用文化情怀，建和谐侨社；集华文精粹，倡侨社新风。”

       目前，南非的中文“三报二刊”在内容和出版时间上形成互补，让生活在南非的华人每天享受阅读中文报刊的乐趣。

  2008年6月18日，南非华人终于等到了久盼的春天。经过了漫漫8年的等待，他们花了120万兰特聘请曾为前总统曼德拉（Nelson Mandela）辩护的著名律师乔治·比索斯（George Bizos）来打官司，华人终于胜诉，获得了与黑人等同的地位与权益。

       这意味着凡在南非出生，以及1994年6月1日以前入籍的大约2万名华人，可享有“黑人经济振兴法案”（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所赋予的优惠，如以优惠价购买股票、在职场上获得优先晋升等待遇。

       南非华人协会主席钟定新欣慰解释道：“其实老华侨经过数十年、几代人的努力，已经不再是‘弱势群体’，我们不需要政府‘特殊照顾’也可以过得很好。之所以那么努力争取‘黑人’身份，不过是要南非还我们一个公道，向历史证明华人与黑人一样，也是当初‘种族隔离政策’下的受害者。”

       1994年5月，在当地首次全国大选中，曼德拉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以他为首的政府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允许各族人民自由参政。

       4位来自台湾的华人议员——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的黄士豪、印卡塔自由党（IFP）的张希嘉、南非独立民主党（ID）的王翊儒以及南非最大反对党民主联盟（DA）的陈阡蕙，刚好碰上了这百年难得的机遇，在南非政坛上撑起了华人的旗帜，并且实现了他们个人的政治抱负。

       在2004年南非国会选举中，4人成为南非首批华人国会议员，改写了南非议会中没有华人身影的历史，成为当年轰动当地华社的一大喜事。王翊儒说：“我感到非常光荣，毕竟华人占南非总人口还不到1%，能够当选十分不容易。希望自己从政，可以为南非华人争取到更多福利。”

南非华人国会议员——王翊儒。

另外，12岁跟随父亲从台湾来南非的孙耀亨律师，2006年3月刚刚33岁时成为约翰内斯堡首位华人市议员。目前，5位台湾人先后跻身国会、市会，且分属多个党派，既有执政党，又有反对党，这是难得一见的现象。

       目前，南非第二代、第三代的华人是被寄予厚望的一群。南非国会议员陈阡蕙表示，他们一直都在积极物色一些有潜质的华人青年才俊，如受过高等教育、拥有良好的外语基础又擅于社交的人，给他们提供历练机会，培养他们从政的意识，为南非政坛注入更多华人新血。

  目前，南非的华人社团据说已有上百个，大约可以分成五大类，各有不同的特色：中国大陆特色的社团有30多个，台湾特色的社团有40余个，属于香港特色的社团仅一个，由老华人创办的社团和其他综合性社团各有十多个。

       早期，南非华人社团多属于血缘及地缘的组织，皆以“寺庙”或“祠堂”的形式成立同乡会、互救会、宗亲会等。以团结互助、自给自足为原则。

如今最悠久、最有名望的社团要数杜省华侨联卫会（Transvaal Chinese United Club），由顺德华人于1909年创立。这拥有一百年历史的会馆，已成为南非顺德华人名副其实的“归宿”。前会长梁职臣说：“以前老华人的日子枯燥无味，幸好会馆将大家凝聚起来，大家在这里拉二胡、唱戏……外面一有风吹草动就躲进来，在这里暂避风头、从长计议。”

       数十年以来，联卫会所一直珍藏着孙中山先生当年参加革命活动时，为答谢海外华侨而亲笔题写的“博爱”二字的文墨，视为镇馆之宝。直到中国侨联为筹建国家华侨博物馆，在世果各地征集文物时，杜省华侨联卫会慷慨地将它捐赠出来，此举让该会荣获“爱国侨社”之美誉。

       众多会馆中的佼佼者要数福建同乡会。它由叶北洋、李新铸等一批福建新移民于1997年创立。目前，会员人数超过一万人。2002年，他们以大约100万兰特，购置了一栋房子作为同乡会会址，为南非的福建同胞和赴南非访问的中国同胞提供了一个舒适的活动场所。

       目前，福建华人最多，同乡会的成立把大家聚集在一起，互助互惠。会长李新铸说：“会馆馆址设立是必要的，在海外的华人，有的无依无靠因故丧生，我们同乡会就要帮他们募款，然后处理身后事；每年都会举行节日庆典与同乡们欢聚一堂，共庆佳节。”社会团体除侨联外，还有老人院。

坐落于约翰内斯堡市中心一侧的一栋老房子，门前竖立着一块写着“康宁院”的牌子。这是30年前，一名老移民将自己的旧宅捐赠出来，经过扩充改建、翻新装修而成立的一间医疗设施齐全的老人院。

       康宁老人院是目前南非华社唯一的老人院，一共住了40多名60岁以上的老华人。虽都属耄耋之年，但乡音未改，而且英语十分流利。他们亲眼见证了南非数十年的兴衰，对这块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宁愿孤独终守于斯，也不愿意随家人移民到其他国家去。

       如此庞大的南非华人华侨社团不仅仅善待自己的同胞，还对当地贫困居民表示关心慰问。社团侨领们经常组织活动，积极为当地贫困的人们捐款捐物，充分体现了华社回馈当地社会的高尚行为，也为华人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华人初来这片陌生土地，生活艰难、精神寂寞，很多老华人都信仰基督教为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当时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华人小孩不得进入政府学校就读，唯一的选择就是基督教会学校。在耳濡目染下，华人的第二代很多都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基督徒，基督教是目前众多老华人信奉的宗教。

       8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移民的到来，佛教便开始登陆南非。慈济、佛光山等佛教团体，纷纷在南非各地设立联络处，建立道场。1996年南华寺的落成，是佛教弘扬非洲的重大里程碑，也让许多来自大陆的新移民，寻找到了自己的心灵皈依处。

       在南非，慈济基金会深得民心，保持了一贯的大爱精神，把慈爱散播南非各地，甚至扩大至周边国家。他们除了发放布施食物、必需用品外，还会教导如何回收资源，提高当地人的环保意识。

       此外，当地的电台每周还挪出一小时，让慈济功德会播放他们的节目，通过有声媒体来传播大爱精神。

       坐落在开普敦市的码头边，有一座被命名为“朝天宫”的妈祖庙，里头供奉着一尊有着“海上女神”称号的妈祖像。

       2001年7月，一名台湾人从台湾云林县北港朝天宫，将这尊妈祖及其身边的将领，不远万里搬迁到开普敦朝天宫。这一尊面容慈祥、裹金披银的妈祖神像高1.6公尺，是非洲大陆仅有的一座。她保佑每年近千艘停泊在开普敦海港船舶的出入平安。

       自2007年起，华社还每年一次的举办“妈祖千里出巡南非绕境活动”，为南非人民祈福消灾。妈祖绕境巡安经过开普敦、布鲁方丹（Bloemfotein）、德班（Durban）、纽卡索（New Castle）及约翰内斯堡等城市，行程共3700多公里。妈祖驾到之处，不仅当地华人列队迎拜，就连黑人有的也在路旁伏地膜拜，场面极为感人。

当汽车还在数公里以外的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尽管中间隔着一片绵延青翠的草原，但清晰可见琼楼金阙的南华寺矗立在远方。南非华人更直截了当地形容：“像紫禁城一样”。

       南华寺是台湾佛光山的一个分部，是南非宗教界的一朵奇葩，也是佛教在非洲的弘扬地。它坐落于距离约翰内斯堡市130公里的一个幽静的小市区里，占地12公顷，于1996年竣工。其规模庞大，结构完整，有大雄宝殿、禅净林、图书馆、滴水坊、安乐堂、南华村、信徒会馆等，是非洲地区最大的一组中国传统式的仿古建筑寺庙。

       寺庙时常举办一些与佛教或中华传统有关的活动，如元旦放天灯、分派腊八粥、皈依典礼、各种法会、讲座、青年营等。不管新老移民，大家都能共聚一堂。

       同时，南华寺的建立给当地人带来了许多好处，佛学院为非洲培养过数批弟子，以传播光大佛法。此外，也时常为当地人举办布施活动，助贫济难，捐助衣服、食物、药物以及轮椅等。

       由于佛教在非洲传播尚属初期，当地文化与佛教文化有着一道不易跨越的鸿沟，故在非洲立寺弘法遇到的问题会比其他地方多。南华寺导师依淳法师表示：“万事起头难，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是万世伟业，如今我们已经播下了一颗很好的种子，只要用心地去耕耘，一定会有丰硕的果实。”

百年以后的今天，来到南非的华人已不仅是怀抱着一个单纯的「淘金」梦想。他们来这里创业，并愿意融入这一块充满着希望的土地，一代接一代地生活下去。

       华人都期盼二零一零年世界杯的到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都热爱足球，而是寄望于这个全球瞩目的足球盛会，能够激起南非政府整治治安的决心，让南非恢复昔日的宁静。

马达加斯加是非洲第一大岛，也是全球第四大岛。它位于印度洋西南隅，隔着海峡与莫桑比克遥遥相对，是印度洋航运要冲，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从16世纪起，葡萄牙、英国和法国先后入侵，最终于1896年沦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获得独立，1992年改国名为马达加斯加共和国。

       马国的经济以农业为主，除稻米外，盛产咖啡、甘蔗、香蕉、棉花与花生等，主销外国。工业基础薄弱，主要有农产与食品加工业以及纺织业。

       岛上的居民98%是马达加斯加人，另有少数科摩罗人、欧洲人、印度人及华人。

 早期马达加斯加华人移民可分为自由移民和契约华工两大类。

       根据英国传教士雅礼士（Ellis）的记载，1862年他在塔马塔夫（Tamatave，当地华人称之为邹省）见到一间华人所经营的杂货店。相信这是关于马达加斯加华人自由移民的最早记录。

       之后，华人移民便陆续到来。在19和20世纪交替之际，许多华人离开毛里求斯，迁居到马岛来。塔马塔夫往往是华人移民在马达加斯加的落脚点，由此处沿着东部海岸，向各地作辐射性扩散。此外，一些华人移至北部的迭戈苏瓦雷斯（Diego Suarez），一些则到南部的富多凡（Fort Dauphin）。不过，这段时期的华人移民人数并不多，流动性也很大。

       而契约华工的招募和移入，则始于19世纪末。1896年马达加斯加沦为法国殖民地以后，由于马达加斯加的一些地区人烟极为稀少，劳动力也不足，殖民政府遂从越南北部东京（Tonkin）的芒街（Moncay）招募了首批人数约有3000名的华工，并将他们分为4批运抵塔马塔夫。

       在20世纪初，殖民政府又在中国招了3000名契约华工，他们之中有的来自广东的南海和顺德，有的则来自福州。他们被分配到各地去，有的负责开凿运河，有者从事农耕，其他的工作还包括了铺路、运送物资或建桥等。工作环境极不卫生，生活条件又恶劣，病死的华工更是不计其数。

       殖民政府统治期间，这里的华人主要都是批发商、零售商和中介商。

       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的贸易，华人均有涉足。在乡村的华商一方面经营小杂货店，另一方面又深入穷乡僻壤去向农民收购土产，接着转手卖给城市的华商销往国外；城市的华商则多数经营零售店以及贸易商行。

       尽管法国政府的诸多法令限制华人移民入境，但到了1959年，岛上已有8032名华人。不过，马达加斯加独立十年后的施政，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特别是经济国有化、以马语取代法语的教育政策等因素，都迫使超过3000名华人离境，迁至法国、加拿大和留尼汪。1975年，岛上仅剩下4039名华人。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华人新移民纷纷涌往马达加斯加。1987年，岛上的华人已增加到1万2000名。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些过去的中资企业员工与中国政府公派的工作人员留在当地发展业务，并成为马达加斯加的新移民。他们廉价收购岛上的红木、拉非草、海参等土货，然后销往中国以赚取极其丰厚的利润。他们的成功例子吸引了更多的新移民前来，尤其是在1995年后，新移民一批又一批地涌入，使马岛的华人人数激增。

       21世纪马达加斯加华社已不再单单是来自广东南番顺（南海、番禺、顺德）的老移民，当中也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华人新移民。走在这里的大街上，传到耳中的，有老移民讲的顺德话，也有新移民说的普通话。

  马达加斯加的贫穷非但没有令华人却步，它的落后反而被视为一种商机。

       尘土飞扬，马路到处是坑洞，疟疾横行，卫生环境和医疗设备欠佳，仍然阻止不了华人的到来。至今岛上有一万多名老华人，近两万名新移民，30多万名混血华裔，散居各地。6省之中，数首都塔那那利佛（此后称塔那）和塔马塔夫华人人口最集中，新移民更是聚居在首都塔那。

       98%的老华人是顺德人，绝大部分从商。从零售到批发，从小买卖到大企业，无论大小生意，他们都有参与，从而奠定了老华人的经济基础。

       新移民来自福建、广东、浙江、黑龙江、上海和辽宁等省市，其中以福建人居多，塔那有近40%新移民是福建人。进货柜，卖中国制造的廉价物品如服装、家具、毛毯子及拖鞋等日用品，似乎是大部分新移民谋生发财的门路。另外也有从事矿业、建筑业、出口业和餐饮业。

       纵然殖民地时代入籍法国并不受限，但是鉴于“改国籍即是走狗”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保留中国籍对当时的老华人来说是一种荣耀。在非洲地区，马达加斯加是华人保留中国籍人数最多的国家。

       今天，这里的华人多数是永久居民，入籍很困难。倘若父母都是中国籍，孩子即使在马达加斯加出生也不能入籍成为公民，除非获得总统批准；父亲是中国籍，母亲是马达加斯加籍，孩子经过申请多数获准入籍，但父亲始终不能入籍；如果父亲已入籍，母亲仍是中国籍，所生的孩子享有自动入籍的权利。

       除了因为入籍不易，对一些华人来说，他们更情愿保留中国护照。毕竟这是一个发展尚不稳定、基建设施落后的国家。

   塔马塔夫是马达加斯加唯一的国际港口。可是在这全国主要城市里，仍有人光着脚走在石子路上。

       新移民初来乍到，眼见当地人都是“赤脚大仙”，不禁吃惊。后来了解到当地人没穿鞋是因为鞋子太贵，他们负担不起。商业触觉敏锐的新移民于是大量入口廉价的中国鞋，以满足当地人的需求。

 物资短缺，等同潜藏着无数的商机。新移民从中国运来大量廉价的日用品、衣服、家电和家具等，再批发卖给当地其他商家。现在，一些商品已经到了饱和点，想赚快钱并不那么容易。

 除了入口贸易，搞出口的新移民也捞得风生水起。马达加斯加矿产丰富，各类矿石、宝石、化石吸引无数出口商。来自中国的水晶专业户，在马达加斯加从事水晶收购和出口的有数百人，每年出口到中国的水晶超过上百个货柜。

       新移民的生意趋向多样化，逐步进军加工业、旅游业、餐饮业、建筑业和娱乐业。有些新移民曾是中国政府公派来到马达加斯加的，从商前已经大致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少数懂得法语的，更是无往不利。

       老华人通晓本地语和法语，在生意上没有语言障碍，重要的是他们与当地人往来已经有几代的经验，了解当地的国情和民情。他们有的是小老板，有的是大企业家；有的在乡间收购土货，有的在城市开店卖杂货；有的在塔马塔夫不起眼的餐馆卖当地人偏爱的云吞面（soupe chinois），有的在塔那的酒楼卖迎合当地人口味的煎炸食物；有开西饼屋的，也有开法国面包厂的。

       近年来，来自香港、新加坡、毛里求斯、南非等地的企业家，因当地的劳工便宜，制作成本低，国外又有销售市场，而纷纷到塔那开设制衣厂，促进了当地纺织业的蓬勃发展。

在这块土地上，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华人的宗教信仰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佛道教及传统信仰。

       华人基督教会颇活跃，宣教士除了星期天在教会带领教徒聚会外，也在平常日子忙着探访、带领小组查经、办中文班、插花班、烹饪班等。

       塔那的华人基督教会是马来西亚人负责，塔马塔夫的华人教会则是香港人带领。凭着语言方面的优势，他们既可以照顾讲顺德话的老华人，也可以关心讲普通话的新移民。而历史悠久的天主教会则继续满足懂得法语的老华人在宗教方面的需要。

       华人在上天主教堂的同时，在家里也供奉关帝、观音、弥勒佛等神祗，初一、十五也循例到关帝庙祭拜。对他们而言，天主教是他们的宗教，拜关帝和祖先是他们的传统习俗，可以并行不悖。

       除了宗教团体外，华人社团也在新老移民的生活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与影响。

       首都塔那除了有历史悠久的京城中华总会，近年还增设了多数由新移民商人组成的华商总会。

*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马达加斯加，旅游公司老板刘凡于2005年设立了一个有关马达加斯加的中文网站www.feizhou.cn，也在2008年设立了一个以英文和法文介绍马达加斯加的网站www.hellomada.com。*

当地人耽于逸乐，重视享受生活和大自然美景，这点也影响了在那里土生土长的华人。平日他们不常到塔马塔夫海滩，因为这里鲨鱼为患。但是在塔马塔夫的华人，至少在年初一这一天休假，开车带家人到60公里外的福勒珀特海滩（Foulpointe）游泳、野餐。

       除了生意上多聘用本地人员工外，华人家务也有佣工代劳。通常一个家庭聘用一个佣工；但也有一对夫妻有5个工人服侍的。面包厂老板吴先生说：“5个加起来一个月大约200美金，还负担得起。”几个工人分工合作，有的负责洗衣、打扫、煮饭，另外还有园丁、司机和轮班看更守夜的。有的雇主家里虽然有洗衣机，却还是让工人洗衣服，“省电嘛，反正已经付他们工钱了。”

       华人口中常抱怨这个岛屿的交通不方便、卫生条件恶劣、医疗设备落后。但是实际上他们对这里的居住环境还是挺满意的：“空气清新，没什么污染，土人也善良。吃的食物，都不沾农药；海产也全是从海里直接捕捞来的。”

       在塔马塔夫搞报关运输的晓燕，常藉生意为由往塔那跑，“那里才比较有都市生活的舒适和感觉。”在大城市住惯了的人要适应这个设施落后的地方，的确不容易。还有的新移民抱怨当地中餐不够地道，就是早茶也是近年才得享有。“现在至少可以吃到油条、豆浆、猪肠粉、烧卖、稀饭、点心、油饼。”一名新移民表示。

       在马达加斯加住惯了的新移民，要回家乡也不容易。“在这里，想中国；在中国，想这里。”这里住得舒服，有人服侍、空气好、气候也宜人。中部高原地区属热带高原气候，夏天的塔那最热不过是20度，冬天最低温不过8度。“离开这里反而不习惯。”

       但舒适的生活中也有隐忧。老华人勤劳，奉公守法的良好行为，获得当地人的赞誉与尊敬。但在近年涌入的新移民中，有些人教育水平偏低，行为粗鄙，缺公德心；有的是暴发户，蓄意炫耀，目中无人，破坏了华人向来的良好形象。有的新移民为了要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不择手段。他们公然行贿、逃税的行为，是令其他人所不齿的。

       一名老商人说：“他们不缴税，把价钱压得很低，造成了恶性竞争。他们是外地人，一旦形势逆转，可以一走了之，而我们是老实的生意人，奉公守法，到头来吃亏的是我们。”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老移民间的对立。

* *马达加斯加许多菜种是新移民带来的，如白菜、冬瓜、菜心等，这些都是马达加斯加人之前没听过也没吃过的。随着这些菜越来越普遍，马达加斯加人也学着华人的发音称呼这些菜，乍听之下像是普通话和顺德话之间的发音。另外，当地人称红毛丹做Litchi Chinois（中国荔枝）。*

京城中华总会礼堂一般租给华人办喜事，但是丧事租用场地分文不收。图为丧礼结束后，人们走出京城中华总会，将花圈一一搬上车。

华人家里同时供奉关帝、观音等神像，也在一旁摆放十字架和圣母像。每天早晚上香两次亦不忘记念赞颂圣母的玫瑰经。

致使马达加斯加的中文学校在抗日战争时期多达13所。

       学校里以顺德话教学。当时华人有99%是来自广东省南番顺三乡，其中又以顺德人居多，所以以顺德话教学是理所当然的事。

       自70年代马达加斯加实行经济国有化和以马语取代法语的教育政策后，华人人数急速下降。一向以募款弥补经费的中文学校，因为经济困难以及学生人数下降而相继关闭。与此同时，为了孩子的升学和就业需要，家长开始不主张孩子花太多时间和精力在中文课业上。学校也在这方面做出调整，减少中文课，甚至取消中文课。慢慢的越来越多学生转到法文学校就读。

       历史上曾有3所影响较大的中文学校：中国国民党创办的兴文学校、一群与国民党政见相左人士办的华体学校、以及原本在中国传教的法国天主教人士创办的华人天主教中心（又称古友道学校）。前两所学校后来合并成为塔马塔夫华侨小学。

       如今，马达加斯加的中文学校只剩下在塔马塔夫的邹省华侨学校，学生人数大约300至400人，多数是混血华裔，当中也有马达加斯加当地人和华人子弟。他们得学好几种语文，包括法文、英文、马文、普通话和顺德话。中文部有6位老师，4位是当地华人，负责教顺德话；另两位是由中国公派来的老师负责教普通话。教普通话的两位老师，也得会讲广东话。

       除了学校教中文，各团体如社团、宗教组织和一些新移民也开班教普通话。前来就学的更多是当地人。学会简单的中文对话后，他们可以为华人雇主打工。不懂中文的雇工月薪大约6万阿里亚里，懂中文的大约有10万阿里亚里，若中文程度不错当起翻译来还可有高达60万阿里亚里的收入。

华人从这里的贫穷和物质匮乏中看到了商机，并因此在这里落脚。

       老华人初来时深信会有回中国的一天。但是中国境内总是烽火连天，动荡不安，使他们有乡归不得，只得留在马达加斯加，一代又一代的繁衍生息。

       新移民口口声声说不会在这里久留，但有人居留了近二十年。或许不是情势不允许他们回去，只是这里总有牵绊。或许是生意，或许是家庭，或许也是因为习惯了这里的环境。

       这片土地似乎仍在召唤更多人来认识它、发展它、爱惜它。

 毛里求斯位于印度洋西南隅，四面环海，碧海蓝天，四处绿浪翻波的甘蔗园，是这里的一大特色。作为非洲著名的蔗糖出口国，蔗园占该国总耕地面积的90%，国家的出口收入中，有15%是来自制糖业。

       这个小小海岛，曾先后被荷兰、法国和英国占领，受殖民统治长达370年之久。这期间，来自欧亚美非各洲的奴隶、劳工、商人和殖民者相继抵步，渐渐于此安居下来后，进而组成今天这个多元种族的社会。

       如今，黑、白、棕、黄各种肤色的人们，在这里融洽生活。宗教信仰的自由，也让印度神庙、天主教堂、清真寺以及华人寺庙，在市区毗邻而建。

       一个好山好水、气候宜人的国度，还得加上政治经济稳定，种族和睦，才称得上完美。作为天堂蓝图的毛里求斯，这些条件可说是兼而有之，难怪居住于此的华人都是那么的快乐。

华人踏入毛里求斯，已经有250年左右的历史。

       1760年，有300名华工从巴达维亚（Batavia，今印尼的雅加达）被带到毛里求斯来从事农耕。航行中的一场狂风暴雨，使其中一艘满载妇孺的船只沉入大海。这突而其来的严酷打击，导致幸存的华工因为过度悲伤而不愿耕作，最终遭遣返回国。到了1829年，英国殖民政府再次尝试引入200名华工，结果这一批华工也因为拒绝从事农耕而被遣返。

       由于甘蔗园的面积不断扩大，致使劳力的需求量大增。从1840年到1843年间，当地园主又从新加坡和槟城，招来了3000名华工。除了在甘蔗园工作，也有一部分人在路易港（当地华人习惯称之为“波累”）从事码头搬运以及船舶建造等工作。许多在甘蔗园工作的华工，在契约期满之后都不愿再续约。

       从1840年开始，大部分华人都从事零售行业；适逢当时有大批的奴隶获得解放，并且散居各地而形成了农村社会，华人商贩也就因此有了更多的商机。与此同时，中国的南方沿海地区门户开放，大批福建以及广东南海、顺德（简称南顺）、番禺等地的华人，涌入毛里求斯的城乡之中。从1847年到1860年，这里的华商人数高达1164人。

       广东梅县的客家人，是在1860年前后以商人身份来到毛里求斯的，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客家人的人数和势力都超过了福建人以及南顺人。眼见本身的竞争力开始减弱，后者于是便迁到马达加斯加、留尼汪、塞舌尔以及南非等地。留下来的华人，有侨生约2500名，及客家人两万多名。除了从商，他们当中也有一两千人从事木工、饲养业以及蔬菜种植。

       到了19世纪末，早来的华人移民终于获得毛里求斯的居民身份。

       从20世纪开始，华人开始涉足行医、教书及办报等领域。1901年，58名客家妇女成了第一批华人女移民，她们大多是客家男移民的妻女或亲友。从此以后，华人人数就自然地增长起来。

       迈入1920年代，当地各姓氏的华人，已经着手修建自家专属的祠堂。南顺人一般称之为霍宅或陈宅等，至于姓刘、关、张的华人则有古城会馆。此外，还有张氏公馆及黎氏旅馆等。

       华人批发商大多数都聚集在路易港市。散居于各区的零售商，每隔一段时间便到市里来办货。因为交通不便，他们通常都会在市里的祠堂留宿。同胞们相聚，有时便一同搓搓麻将，并把“抽水钱”充作祠堂的经费。

印有朱梅麟头像的25卢比纸币。

后来，一部分华人从小生意转型到小规模、低技术的工业，例如肥皂、香烟糖果制造，或是铸铁以及酿酒等。他们所累积的资本，让那些接受西方教育的新生代，得以在政府的扶助之下发展大规模、高科技的新企业，如汽车装配、铝制品制造、深海捕鱼、罐头制造、建材制造、冷冻食品等。

       自1968年独立以来，毛里求斯华人的经济地位逐步提升。无论是大小生意，或各个专业领域，都留下华人的足迹。除此之外，政治也是他们大展雄图的舞台。华人部长曾繁兴、陈念汀、邓学升、市长霍恩祺等人，都是个中翘楚。

       值得一提的是朱梅麟这位杰出华人。祖籍广东梅县的朱梅麟（1911-1991年），是毛里求斯的第二代华裔，在31岁那年，他当选为毛里求斯华商总会的主席。二战期间，他号召华人成立中国人国土保卫队以对抗侵略者。

       二战后，朱梅麟代表华人出任立法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在53岁的那年，也即是1964年，获选为国会议员，并于3年之后出任地区事务部部长。毛里求斯为了表彰朱梅麟对于国家的贡献，特别在1991年发行了印有朱梅麟头像的25卢比纸币，作为纪念。

路易港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也是年吞吐量达300多方吨的大海港。华人主要就聚集在这个首都城市。

       岛上华人另一聚居的地方，便是那迷人的鸠必（Curepipe）小镇。这里地势较高，常年气候宜人。由于法国人在殖民时期大多聚居于此，因此该市遗留下来的建筑物，呈现出浓烈的法兰西风情。

       2万3000名华人中，约98%左右已取得毛里求斯国籍。其中约有2500名南顺人，50名福建人，其余都属客家人。如今，岛上华人不分籍贯，亲切往来，洋溢着浓浓的乡情。

唐人街曾经是路易港华人主要的生活据点。他们或住在店屋楼上，或把平房前后两半分成店铺及住家。后来，许多业主都搬走了，唐人街成了纯粹营生的所在。同在一条唐人街上做生意的华人，有的还有亲属关系。

       搬离唐人街之后的华人纷纷买地建屋，住的多数是有庭院的洋房。中年人或老人家，特别喜欢在自家庭院种些花草树木，后院的果树中最常见的便是芒果树。事业有成的年轻一代华人，甚至在高级住宅区住下，对住家装潢和摆设十分讲究。

       有的孩子长大或成家后，继续跟父母住在一起，十分难得。为了避免拥挤，这些房子一层一层往上盖，一个大家庭中的每个小家庭各住一层，互相照应。白天，大家各忙各的，晚餐时间便是联络感情的好时光。

毛里求斯华人的饮食已经融合了不少当地饮食文化。午餐，随便一个夹馅的圆面包或法国面包便解决了；晚餐，除了白米饭及中式菜肴，往往还备有法国面包、印度咖喱与煎饼，还有克里奥尔番茄肉汁等，传统家庭还会端上自制的糯米酒。一家人围着圆桌子，边吃边聊。饭前饭后，一起预备，一起收拾，由此维系了一家人的感情。

       毛里求斯华人以客家人居多，他们钟爱自己的家乡菜。华人若是到中餐馆，少不了要点盘梅菜扣肉或白斩鸡。这里的华人吃惯一样东西通常就不会改变，因此中餐馆无需经常更换菜式。在当地，若想吃上日、韩料理，往往就得到高级酒店去。

       华人主妇们热爱观赏韩剧。她们或到店里去租借，或与朋友们交换观赏。有时，还到中国文化中心去借取连续剧光碟。年轻一代由于中文能力不济，惯于欣赏法语电视节目，小朋友爱看的动画片，也是法语配音。他们从小学习克里奥尔语——一种他们称之为“没有语法的法语”。新生代似乎离中文渐远，掌握得较好的是克里奥尔语、法语和英语。

虽说最后是从英国手中取得独立，但毛里求斯受法国文化的影响，却更为深远。

       中中校友会的田先生解释：“法国统治毛里求斯时期，有很多法国人跑来岛上住，尤其是到鸠必市来，所以人民跟法国人接触较多。在英国统治时期，来的只是统治阶层，平民在生活上不怎么接触到英国人。”

       从小到大受环境的濡染，华人精通法语和克里奥尔语。入学后，他们接受英文教育。因此毛里求斯的华人子弟在中学毕业后，得以到英国、新加坡或澳洲等地去深造。华人家长说：“现在约有300多名子弟到新加坡去深造，那里学费较便宜，在那儿工作的薪水也较高。”

       好些当地的华人子弟在国外毕业后，选择留在国外发展，甚至移民到加拿大、英国、澳洲、法国和新加坡。“这也难怪他们，花了那么多钱到外国读书，难道还要回来赚卢比吗？”父母对孩子们留居海外的选择，没有异议，只有祝福，也很乐于飞往国外，去探望已成家的晚辈。

       虽然有些人担心，这土地上的华人会越来越少。然而，富有前瞻性、自认是世界人的前华人部长曾繁兴却认为，应该让每个人自行决定要往哪里去。他坦言，既然国家无法支付高薪，回来发展的空间又有限，因此回来与否还是尊重个人的意愿为好。

CHAN Supermarket营业30年，是路易港历史最悠久的华人超市。

在唐人街或在其他商铺里招呼顾客的，大部分都是中老年华人。他们坚守着这小小的商铺，并不要求年轻人回来继承父业。

       路易港华人商店的发展不及其他族群。华人守旧的作风，让业务发展受到局限，老迈的店主也不想再操劳。在鸠必市，华人的大小店铺约有100间，几乎都有三四十年的历史了。这些小店，或许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消失。

       卖了30多年婴儿用品和玩具的钟先生，冷静而略带惋惜地说：“由于新一代华人不爱做生意，所以没了接班人，再加上来势汹汹的大商场，我们这些小店可能要被淘汰了。”他早有了心理准备，打算再做个三五年就关店，反正也到了退休的时候。

       “我8岁就在父亲的店里帮忙了。有时还推着脚踏车去卖香蕉、雪糕和蛋糕，很多还是我们自己做的呢！”华商经贸专业联合会会长叶庆贤回忆道。当年，为了配合电供时间，他们半夜就得起床做雪糕；为了第二天拥有足够的用水，每天还得来回走上半公里取水。

* *路易港市的华人商店，中文老招牌沿用至今。那是因为早期在市内的华商以批发商居多，他们的顾客群多数是散居各区的华人零售商。反观鸠必市华人的商店不见中文招牌，是因为他们的顾客群，多为不懂中文的印度人及克里奥尔人。*

       如今，一切艰难岁月都熬过去了。来日的毛里求斯，肯定也比今天要更进步繁荣。时代改变，人人都在与时并进，华人因此也不愿自身的经历在下一代身上重演。父母们懂得适时地放手，让新一代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天空。长辈们的信任与支持，是毛里求斯华人青年的福气。

当地华人，大多在家中庆祝传统节日。稍微隆重些，便到会馆或餐馆去聚餐。在毛里求斯，唯独农历新年是全国华人普天同庆的佳节。

       政府为了照顾多元种族社会的需求，各民族在一年之中，都享有本民族节庆的假日。农历新年为华人社会的公共假期。

       虽然假期只有一天，但华人商店一般会放上一至两个星期的假。留在岛上的，会到海边或酒店去过年，其他则选择出国去度假、旅行。

       春节前后，各社团如仁和会馆、南顺会馆、华联以及中国文化中心都会举办联欢活动。华人会将年糕分送给朋友及其他友族。一些异族人士，也跟华人一样挂上红彤彤的灯笼，分享一份中华节庆的欢愉氛围。

       一般上，华人在春节前夕会大扫除，有的甚至换上新的牙刷、毛巾，以迎接新的一年。华人家庭也坚守着大年初一不扫地的旧俗，有些人还坚持这一天要吃素。

 尽管拜年风气已不大盛行，但长辈们仍会在春节派红包给晚辈们。孩子们喜盈盈地收下红包，加上噼啪作响的爆竹声，无不增添了佳节的气氛。待客用的食品，不外是瓜子、花生、汽水、小糕点及炸番薯。除夕夜的团圆饭席上，白斩鸡、腊肠及烧肉等，也都是少不了的佳肴。

到关帝庙去还愿的信徒，还会特地准备烧肉、白斩鸡、水果，以及毛里求斯特产的红酒等贡品，焚香祝祷，感念神明一年来的庇佑。当地华人普遍崇信关帝，除了修建关帝庙外，不少人也在家中供奉关帝像。

       耸立在路易港的关帝庙，是非洲华人兴建的第一座庙宇，竣工于1842年。当年，福建籍华人领袖陆才新向政府申请准证，在自己的土地上将庙宇兴建起来。后来，广府人邓云接管了它，并在十多年后增建了一座天后宫。

       邓云逝世后，人数激增的客家人开始挑战南顺人的领导权。1903年，为了竞选关帝庙主席一职，彼此间爆发了一场流血冲突。经过最高法院的裁决，每年由客家人、南顺人和福建人各派5名代表组成委员会共同管理。主席一职，则由3个帮群的成员轮流担任。

       近几年，委员会人数已从15人增至21人，因此各帮群均有7名代表。今年若是客家人当主席，南顺人可能当财政，福建人则当秘书，以此类推。但如今，要找福建人来当委员已是不容易，因为全岛只剩下大约50名福建人。

       如今，当地华人不分籍贯，即便从小接受洗礼的男女老少，也都踊跃参与关帝诞的庆典。当晚参拜后，与会者每人都获分一包寿面。第二天晚上，买了餐券的信徒，也会一家大小到庙里或会馆去聚餐。

餐会上，大伙儿都以法国人脸贴脸的方式打招呼。一道菜来了，大家狼吞虎咽，没有你推我让，拖泥带水。聚餐结束，彼此皆心满意足地道一声再会。

* *当地华人女性，在婚后就得更新身份证，改冠夫姓，将原父姓列在Maiden name一栏。所谓父姓，就是父祖辈初来此地时所登记的全姓名。例如杨太太原名Kim Kiow，婚前姓Chun Fat，婚后姓Yeung Sik Kuen，而这Yeung Sik Kuen即是她家翁的全姓名。*

       中秋节、端午节也是华人重视的节日。除了春秋二祭到坟场去扫墓外，他们也在天主教规定的11月1日上坟扫墓。白天，他们到庙里和坟场去进香献祭，晚上又是一顿聚餐。聚餐是当地华人碰面、联系的场合。

       在毛里求斯，年轻人的婚礼与婚宴，可是阖家重视的一大盛事呢！

       当地华人结婚都不租借婚纱，新娘们无论如何也要购置一套专属于自己的白色婚纱。一生一次，她们无比珍惜地将它从婚礼一直穿到晚宴。结婚当天，一家人都动员起来从早忙到晚，既劳累又开心。乍看之下，一会儿犹如大型表演的后台般忙乱，一会儿又好像奥斯卡颁奖礼那般隆重。

       上午时分，新人在天主教堂举行婚礼。走在红地毯前面的是新郎和他的母亲，接着双方亲戚成双成对地紧随其后，接着是花童和伴郎、伴娘，最后才是新娘子挽着父亲的手，款款走来。

       神父用法语主持庄严的婚礼。乐队当场奏乐，献唱出一首首温馨的曲子。每年的七八月是结婚旺季，教堂的婚礼，是一场接着一场。

       一般上，晚宴也极尽丰盛热闹。除了办喜事的两家人，其他与会的男宾女客，也都纷纷盛装出席。

位于拉沙麟的华人公墓——南顺会馆坟场，占地9英亩。一些坟墓有多层地下棺位，能容纳6至11副棺木，可供家庭成员合葬在一块儿，象征他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 *毛里求斯的新移民不多，有些是过埠新娘。十年前，曾有人到中国的酒店去，安排女子前来面试。不合意，便给个红包作谢礼；没给红包的，就是未来的妻子了。*

在毛里求斯，紧密联系的不只是同一个屋檐下的人，整个同文同种的华人社会，也视为自家人。

       各个社团组织加强了华人的凝聚力。岛上影响力较大的社团，要算仁和会馆、南顺会馆和华商经贸专业联合会。

       仁和会馆已注册140年，如今的参与者都是老人。其中，60、70岁的会员要算“年轻”了，董事们也都在70岁以上。会馆设有书报社，是乐龄人士聊天、看电视及翻阅书报的好去处。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早期华人打工、从商，赚了钱就慷慨捐赠，让今天的会馆在唐人街拥有约3亿卢比的资产。藉由征收店铺、停车场的租金，会馆不仅足以应付日常开销，每个月还捐助500卢比给70多位孤独的贫困老人，而会员每年只需缴纳10卢比的会费。

       南顺会馆于培英活动中心举办的各种课程、培训，深获学员支持，形成了一股热爱学习的风气。志愿人士热心的奉献，令培英中心的课程显得丰富而多样化，包括太极拳、健身操、集体舞、美术、粤语和普通话等。

       鸠必的中华学校旧址，也是华人聚集活动的场所，不乏各项有益身心的活动。一位从台湾嫁过来的舞蹈老师，就常在那儿教授舞蹈。每年的春节文娱晚会，中华校友会都呈现舞蹈表演。

       建筑师卢烟胜在唐人街发起并筹建的华人文物馆，保留了毛里求斯华人的大量历史文物。文物馆里，每一件东西都有自己的故事。一个40岁的年轻人，竟对这些“破铜烂铁”如此珍视，确是难能可贵。

       馆内一辆生了锈的脚踏车，正是爸爸从前载孩子们上学的工具，寄存着卢先生温馨的回忆；至于他祖父那一代人，则留下了用篮子扁担“载人”的故事：出门时，女儿蹲坐一个篮子的一边，另一边则放置石块，平衡重量，摇摇晃晃地向市场荡去。

       上了年纪的华人，都讲客家话，乡音未改。但日益西化的年轻人，早已与客家人渐行渐远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人担心客家话将走入历史，岛上的乡音也将绝响。

       有些父母，让孩子到中文班去学普通话，或鼓励他们在校选修亚洲语言中的中文课。无奈的是，孩子对这陌生的语言似乎缺少兴趣，更不知学来何用。一些小朋友还坦然表示，他们只是在中文班玩耍罢了。

       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保留岛上华人的历史，有心人可谓是煞费苦心。例如，有鉴于认识方块字的人不多，当地推出了法文版的关帝庙简介小册子。

       此外，岛上著名的华裔历史学家优给特·李卓凡·皮耐欧（Huguette LY-TIO-FANE PINEO）女士，分别用法文和英文，出版了有关印度洋华人移民历史的书籍。

里求斯目前有4份中文报。《华侨时报》、《中华日报》和《华声报》，都属于日报，唯有《镜报》是周报。其中，只有《中华日报》采用繁体字及纵向排版。

       日报的每月订费介于200至230盾（即卢比）之间，订阅者多是上了年纪的华人。每天中午12点半左右，就能收到派报员送来的报纸。有些读者在订阅几份中文报的同时，也阅读西报。他们透过西文报纸获取主要新闻资讯，若想了解华社及相关的活动报导，便得阅读中文报。

       《华声报》为了吸引不谙中文的年轻读者，特地从8页版面中抽出两页，以法文和英文报导中国新闻，并以英文撰写12生肖的每日运程，为鼓励年轻一代对中国及中华文化的认识，可谓用心良苦。

       每家中文报的版面都不超过8页，广告不多。其中刊登较多广告的行业莫过于餐饮业，但由于读者群不大，致使广告效应远不如西文报。与广告相比，在中文报刊登贺词和社团活动通告，则更为普遍。

中国劳工只需缴付邮费，就能免费订阅原价每份8盾的《镜报》。年事已高的《镜报》创办人吴志英坦言，将继续办报，志不在赚钱。

由于报章的发行量和广告收益都不大，加上报馆基本运作经费不断增加，当地中文报业的发展，实在不是一条平坦的路。

       《华侨时报》总经理说：“看中文报的老人渐渐消失，年轻人即使是中文班结业生，也不会看中文报，宁可看西文报纸。几十年后，恐怕就再没有中文报啦！”

       一位年迈的总编辑笑言：“死一个，少一份！”另一位年逾90的老报人也感叹道：“5年后，或许4家报社都不会存在了。”言下之意，那些掌舵的老报人或编辑过世后，华文报业将在后继乏人的困境下，走向终点。

       尽管如此，退休后仍定时到报馆工作的《华声报》总编辑林友成说：“前景虽不乐观，但‘中文报会消失’这话已讲了30多年了。”这显示出中文报业其实韧性不小，总有一股延续下去的力量。

大环境的许可，小群体的努力，加上日常生活中彼此间的守望相助，毛里求斯华人在印度洋上打造了一个乡情浓郁的家园。他们融入多元种族社会，也传承着自身独特的文化。

       年轻一代的华人，在先辈的呵护与培育下，展翅高飞，勇闯他国，开拓未来的新天地。

留尼汪是法国的海外领地，是印度洋上最富裕的岛屿。

       它曾经是一座毫不起眼的火山岛。葡萄牙人是最先到岛上的欧洲人，却不曾占领该地。直到1638年法国人到来，开始对这小岛产生兴趣，并于1642年宣示对它的主权。1810年英国人曾短暂占领，后又于1815年归还法国，留尼汪遂成为法国的海外领地，以迄于今。

       早期法国统治者曾从东非、马达加斯加等地引进黑人奴隶，开荒垦殖，奠定了荒岛的经济基础。他们用血汗和生命，换来一片又一片的咖啡、香料及甘蔗园。后来，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契约工人，也在农耕、修筑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时移境迁，昔日统治者、奴隶和工人的后代，而今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共同组成了融合多元民族元素的岛民——法籍留尼汪人（Reunionese）。

       作为法国的海外领地，留尼汪人民皆享有法国国民应有的权利。岛上各种优惠政策与福利制度，跟法国本土无异，在此居留的华人自然也一样，他们基本上毋须为明天忧虑，生活悠然自得。

1817年，法国当局开始禁止贩卖奴隶，导致留尼汪的农耕、劳力市场劳工严重短缺。法国人于是将目光转向远东，招募了大批中国以及印度的契约劳工。

       第一批华工于1844年从海峡殖民地招募而来。这一批人大多原籍福建及广东，主要从事耕种、伐木和修筑水坝等工作。1845年后的两年间，法国当局直接从厦门招募华工。这批人抵步后，被卖到蔗园及糖厂去当苦力。由于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十分恶劣，许多人在约满之后均选择回国，只有少数人继续留在岛上，转业当小商贩或务农。

       陈章满是首名在留尼汪开店的华人，而“陈”姓在当地的华人群体中，算是最早也最重要的一个姓氏，他们至今仍与毛里求斯的陈姓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848年后，许多解除契约的华工定居下来，并与当地女子通婚。1862年以后，除自由移民外，开始有商人及包括妇女在内的连锁移民，相继来到了留尼汪，他们大多来自福建，以及广东的顺德、南海及梅县一带。

       1875年左右，有大批来自梅县的客家人移居岛上。由于南顺人（南海人和顺德人的合称）在北部已经有极强的势力，所以客家人便定居于南部。留尼汪首名客家商人李定伯（Lee Teng Pan）便是随这一波移民潮来到岛上。

* *在当地，“Reunion”一词的中文译名，因华人家乡话的读音差异而有所不同。一般上，南顺人把它译为“留尼汪”，梅县客家人则译为“留尼旺”。*

       19世纪后期，华商开始掌控留尼汪大部分的零售杂货店。他们那些没有招牌的木板小店，散布于人来人往的路旁，尤其是拐弯处，更是商店的最佳据点。

       整个19世纪，留尼汪华人人数鲜少超过1000名，主要原因是契约华工在期满之后大多选择回乡，有的则迁居到毛里求斯去，仅有少数华人留下来经商或务农。

       迈入20世纪，最后一批华工大规模从福州被招来种植中国茶叶。当时的雇主拖欠薪水，加上粮食分配不足等问题，华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以武力反抗，最终被遣返回国。但是，数年以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又回到留尼汪，还与当地的妇女通婚，形成新一批异族联姻家庭。

       从1910年开始，每年平均有200名华人移居留尼汪。一战过后，华商拥有大约250家的企业。而二战之前迅速发展起来的糖业，也吸引了那些原已离境的华人再度回到岛上。与此同时，也有大批华人从广东迁移过来，从事垦殖、养蚕和经商等生计。

       二战期间，法国被德国占领，以致当时的留尼汪物资短缺。华人于是在岛上开设工厂，即使是偏僻的乡区，都有华人经营的火柴厂、肥皂厂。产品也通过他们经销到岛上各地，供应居民们的日常所需。

       1950年，法国政府禁止外国人移居留尼汪，适逢中国新政权成立，留尼汪的华人移民潮于是便告停息。

       早年移入的华人，曾经在留尼汪的商场上取得斐然的成绩。1967年，岛上区区1万5000名的华人，却拥有大约791家贸易行。到了1970年，华人总共持有3000张贸易执，并且掌控岛上60%的零售业。

       可惜在这之后，局面便开始有所转变，南顺联谊会的陈先生说：“70年代之后，政府的税收越来越高，做老板的不是离开留尼汪，就是转去打工了。”当然，也有头脑转得极快的杂货商，开始进攻小型市场或超级市场。1980年，岛上95家的小型市场当中，就有75家是由华人经营；而18家超级市场之中，便有十家的业主是华人。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大陆移民涌入留尼汪，华人人数也随之增加。至20世纪末，人数已经超过两万。本世纪初，岛上虽未出现显著的移民潮，却至少迁入了近400名温州人，其中一部分人是从法国的其他省份迁来，且能说简单的法语。

早期前来的华人，努力融入当地生活，时至今日，留尼汪华人约有99%是天主教徒、90%已经入籍法国。

       华人多聚集在城市，包括北部的首府圣但尼、圣安德烈（St-André）和圣宾华（St-Benoit），南部则是圣皮埃尔（St-Pierre）和坦邦镇（Le Tampon）。历史的渊源，造成南顺人大多聚居在北部和东部，而客家人则在南部和西部安家落户。今天，这两大群体渐渐摒除成见，有了更多的互动与交流，甚至有了南、北两大庙合办关帝诞的设想。

       如今，杂货经营商的盛况不再，华人大多不再是小商店的老板。一般上，中青代华人若非经营着大规模的企业，便是公司的高级职员、政府部门公务员或专业人士。而当医生则被视为职业首选。

       留尼汪的社会福利及居住环境，令人称羡。然而，若非事先从其他法属地区取得了法国国籍，外来移民实难登陆此岛。但凡事都有例外，学生、过埠新娘、特殊技术人员，都可获得批准入境。

 老一辈的留尼汪华人，从早期的艰苦奋斗，到今日事业有成，虽劳碌多年，却还是退而不休；纵使已将生意交给下一代，他们还是每天到店里或公司去帮忙。

       经营超市的林先生虽已将业务交托给儿子，却仍不断在为发展商务而动脑筋。最近，他决定收回超市附近的店铺，再拆掉修建停车场。“有了停车场，顾客泊车方便，生意必定更好。你知道的，生意做得越大就会越难。”然而，眼见自己开创的超市在激烈竞争中仍然稳健发展，他内心甚感欣慰。

       企业家陈先生说：“现在不会将主要精力放在管理方面，而是继续投资。”尽管拼搏依旧，但近5年来他总算允许自己每年放假一周，去打打高尔夫球或者滑雪，不再像前20年那样，完全不放假。

       他将原有的小型手工业，发展成今天这个拥有50名员工、2000平方公尺大小的自动化冰淇淋工厂。现年82岁的他如今尽情享受退休生活，不再过问厂里的事。

       至于张先生，就不同于其他退休的老板。由于孩子不愿接管他的迷你超市，他只好将它卖给当地一名法国人。如此一来，生活中就不再有什么牵挂，乐得轻松。从前他只能一个人去旅行，因为太太得留下来看店，如今夫妻俩终于得以结伴同行了。

       2008年，张先生几乎成了“空中飞人”。他2月去阿根廷旅行，5月到三藩市参加两年一度的世界顺德联谊总会的活动，7月再组团到中国，8月又飞到法国去照顾孙子。

组团去中国，近年来在当地十分盛行。留尼汪南顺联谊会，每年都组织两三次的中国团。7、8月学校放假，父母会带着孩子们同行。他们自办的旅行团，收费要比旅行社来得便宜。

       由于经济能力不错，他们在中国、法国本土和留尼汪都有自已的房子，在各处逗留几个月根本不成问题。他们飞往法国，可以跟在当地工作的孩子团聚；飞去中国，则又可以观光、探亲。

       有趣的是，老一辈的华人飞到中国大陆去，竟无法用普通话跟中国人沟通，只能借助汉字来表达。这是因为早期当地的中文学校是以客家话或广府话作为教学媒介语，普通话对他们而言非常陌生，但中文书写不成问题。

那些毋须再为家族生意操心的退休人士，有的照顾孙子，有的则参加社团活动，学习普通话或书法，还有人转而参与文化公益事业。酒店业者刘荣基（Law-Hang Narcisse），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想当初，在圣但尼卖杂货实在太辛苦，他于是买地建起了酒店。孩子接管生意后，他和太太自愿地全心打理利涉堂，不觉已有十年。

       位于留尼汪北部的利涉堂和世昌堂，创立至今已有一个世纪之久，且由祠堂发展成今日的关帝庙。两堂曾有心结，一段时间里互不往来。

       自2004年开始，世昌堂邀请利涉堂共同庆祝关帝诞，打破了多年来各自为政的旧习。两堂凝聚的力量，令庆典比往年更为壮观，还赢来市长的支持和赞许。他们定下了目标，期盼将来能联合南、北3座关帝庙的力量，一同欢庆关帝诞，甚至邀请他国的舞狮团前来比赛。

       可以说，从飘洋过海到落地生根，这些老华人已适应了异国他乡的生活。无论赋闲在家还是投身文化事业，又或是帮孩子发展业务，这批年过半百的退休人士，个个老当益壮，在留尼汪过着多姿多彩的乐龄生涯。

* *留尼汪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就是炒饭、叉烧和功夫，并且认为加了酱油的便是中国菜。克里奥尔人与法国人，尤其爱用酱油多过用盐。当地每个月都会从中国入口十几个货柜的蚝油及辣椒酱等调味料，其中尤以酱油居多。*

 海外华人先辈挥洒汗水艰苦打拼，是为了后代能汲取更多的甘露。现今留尼汪第二及第三代华人的生活，正好印证了这样的规律。随着经济能力和教育条件的改善，老一辈华人造就了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孙辈。他们不再局限于父祖辈的行业，而开拓了更广大的领域。土生土长加上很好的法语能力，他们较上一代更快融入当地社会。

       这些年轻人一般每天上班7小时，午休两小时。午餐有的在外头解决，有的则回家吃饭、看电视或小睡片刻。晚餐时间，多数华人都会回到家里，不是自己煮，便是到中餐馆去打包云吞、饺子。在岛上当个上班族是幸福的，每周工作时限35小时，周六、日休息。多数年轻华人周末都不呆在家里，往往开车到海边或上山避暑。

       虽说岛上的物价要比法国本土至少高出20%，但华人上班族最低的薪金也有1000欧元，双薪家庭月入可达4000至5000欧元，比当地人宽裕许多。受薪人士每年享有13个月的薪水，4至6周的年假。酒店经理刘德和指出：“雇主须为员工支付约薪水的50%，充作国家卫生服务的费用，所以打工族无论求诊、住院或看牙医，都无需付费。”如此待遇，难怪这些年轻华人再也不会留恋父辈的小店生意了。

       和上辈人相比，时下年轻的华人子弟，更懂得享受出外旅游的乐趣。从前，华人忙着开店做生意，往往只在农历新年休息一两天；如今，华人身为专业人士，或经营大生意，一两年内去旅行两三个星期，是很普遍的事。

       留尼汪的失业率高居法国之首，还一度高达40%。然而，法国的好福利也是世界公认的，失业单身汉每月可领取400多欧元的救济金。然而，坚持靠双手吃饭的华人却很少领取救济金，即便待业中的华人子弟，也要自力更生。

       当地的电讯局、邮政局、税务局和广播电台等政府部门，都有华人职员。华侨联谊总会秘书萧先生说：“在留尼汪当公务员的待遇，要比在巴黎高出35%，若任职法国银行，还有双倍的薪水呢！”

       另外，公务员若有3个孩子，又服务期满15年，40岁左右便可退休。但华人一般会延长退休年限，因为服务的年限越短，退休金就越少。一般上，他们都坚持工作到60岁。

       对当地上班族而言，除了工时固定、福利完善之外，更不担心会受到剥削。打工生涯结束后，终身享有每月领取薪水65%的退休金。至于生意人，就只好买保险来保障后半辈子了。

       然而，华人人口稀少，加上高度融入主流社会，意味着越来越疏离于中华文化。今天，许多年轻华人已不懂得说家乡话，对华人节庆更是一知半解。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随着国际上中文地位的逐渐提高，许多年轻华人开始学习中文，对华人传统文化也兴趣大增。

现今的留尼汪华社，过埠新娘是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语言的障碍，文化背景与生活习惯的差异，使初来乍到的过埠新娘，面临很多困境。朋友少，生活圈子小，找工作不易，满怀愁绪，郁郁寡欢，孤寂难耐。

       庆幸的是，当地政府在就业方面，为她们提供了辅助，而国家就业中心更乐于伸出援手，使她们得以接受津贴，先接受法语训练，接着再接受职业训练。如此一来，她们终于有机会踏入职场。尽管这过程并不容易，但确有不少过埠新娘在克服重重困难之后，昂然地走向社会。

       过埠华人新娘莉莎，嫁过来已17年，她原是中国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文凭不受法国承认。夫婿替她报名参加训练班，又接受一些培训课程后，她才有了当地第一份工作，感觉融入社会。她曾做过财务助理、总经理秘书等工作，如今主要在学校里教中文，同时也是高级法院指定的翻译员。不爱主妇生涯的她，现在的生活忙碌而充实。

       除了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当地也有不少五六十岁的过埠新娘来自毛里求斯。由于能掌握法语和克里奥尔语，她们在工作、生活方面都比较顺利，有的是公务员，有的开办缝纫学校，也有的在自家的店里帮忙。

       走过低迷的岁月，如今她们终于拨开阴霾，望见异乡天边那一弯彩虹。

们常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认为海岛上的人必定个个热情洋溢。殊不知，在不同的文化熏陶、生存条件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会产生独特的相处模式。

       曾有当地华人作过这样的评论：”马达加斯加华人比较团结，留尼汪华人就缺少一份凝聚力。”显然留尼汪与马达加斯加虽为近邻，但两地的华人社会却风情各异。

       留尼汪华人较少在家宴客，一般请客人到餐馆去享用。不过，他们偶尔也会约上三五亲友，来家团聚。或许受法国文化影响，他们聚餐时不用圆桌，大伙儿循着长桌列席而坐，各谈各的。感觉上，与一般华人熟悉的“团圆饭局”，截然不同。

       他们给客人端茶也十分讲究。茶具是整套端出，有茶壶、奶罐、糖罐、精致的杯碟，还有各色茶包，任君自选。这种喝茶的排场，再加上宽敞的房子、典雅的家具，令人一时也变得温文尔雅、小心翼翼的，不敢稍有莽撞。

       任何人来此岛居住，大概需要一段长时间才能适应。曾在毛里求斯呆过8年，再到留尼旺来生活了15年的黄先生觉得；“这里的华人相见时不太热情，有时也懒得打招呼，不免令人感到无趣。”

       当地浓厚的个人主义作风，导致人与人之间保持着距离，谈话间也尽量避开个人私事，就连探问他人的已婚、未婚，都是不礼貌的。

       然而，这却是一套与法国社会相适应的人际互动模式。或许拘谨其实是优雅，而恪守分寸的话题，则是为了尊重他人的隐私。

安逸的生活、完善的福利，留尼汪华人的日子可说无忧无虑。

       当他国人民还在为失业忧心不已时，这里的华人却毋需过分担忧，有关当局自然会伸出援手。当别人在正业之外仍须寻找副业的同时，他们却有条件、也有理由坚持每周只工作三十五小时。至于华人新移民一路走来，也渐渐在这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在这个印度洋的小岛上，似乎毋需费力耕耘，也能获取生活的保障。留尼汪华人优质的生活环境，令人羡慕不已，却也模仿不来。

安哥拉是非洲西南沿海的热带国家，大自然赋予它美丽而富饶的土地。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石油、天然气和钻石的储量在非洲独占鳌头。

       1885年它沦为葡萄牙殖民地，长达近一个世纪。20世纪70年代，安哥拉独立，定名为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但不久境内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的全国联盟（UNITA）却又同室操戈，展开了近27年的内战，这让安哥拉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民不聊生。

       2002年，内战终于宣告结束。安哥拉政府马不停蹄地倾全力建设，当地经济逐渐迈入正轨，老百姓终于迎来了安稳的生活。“只有政局稳定，华人才有生意可做，才会做长远的打算。”这是当地华人的心声。

  华人移民到安哥拉的时间比较短，一共只有三波移民潮。

       最早抵达安哥拉的十多名华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才登陆当地的。那时中国人创业心切，纷纷飘洋过海，以占得商业先机。当初到来的这一批华人都是以从事贸易以及开设中餐馆为主。

       第二波华人移民潮是在21世纪初，当时安哥拉内战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商机无限，生意嗅觉一向敏锐的华人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此时来到安哥拉的华人仍是以贸易为主，但也逐渐涉足石油、建筑等领域。

       近年来，由于安哥拉的钻石以及石油业的迅速发展，整个国家的经济突飞猛进。中国国营和各大私人公司纷纷登陆，从事地产或制造业，从而掀起了第三波的移民潮。中国人甚至把2008年称为“安哥拉之年”。

如今，华人的足迹遍布安哥拉各地，首都罗安达是华人最集中的地方，至今约有8万名华人，不过暂时还没有华人入籍安哥拉。

       相对于非洲其他国家而言，安哥拉凭着丰富的资源以及巨大的发展空间，成为华人眼中的“后起之秀”。当地华人很多是从非洲其他家再度移居于此，他们经验丰富，在商场上已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投机客。

       在安哥拉只要有商机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华人的身影。其中以民工人数为最多，占华人人口的80%，其他的则是商人和白领阶层。华人承包商、建筑商以及贸易商是华人在当地的“看家行业”；物流业则是新兴行业；制造业和地产业则充满无限生机，被视为“未来行业”。

       安哥拉的华人多数来自中国大陆，尤其以陕西、安徽、四川等地的人居多，他们一般都是在中资企业机构打工。随着中国对安哥拉援建项目的增加，为数不少的华人工程师和建筑民工都来到这个美丽的海岸国度参与建设。

       他们收入参差不齐，比中国要好，也比当地人的高出许多。民工张少华说：“我们这个阶层的工资大概每月700到1000美元不等，因为包吃包住，基本上没怎么动用薪水，单位会直接打入我们国内的账号里。”

       近年来，到安哥拉创业的华人越来越多，很多都是以“夫妻档”或以小型家族企业的方式来经营。这样管理起来比较容易，丈夫出去跑业务，妻子留守店中，生意做得也算红火。不过在此经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文化背景、语言、工作习惯等差异常让华人伤透脑筋。

  在当地做生意的华人，无不怀念2002年安哥拉内战结束以前，90年代后期的那一段黄金日子。中餐馆吴老板说：“那个时期的生意非常好做，基本不需要做任何市场调查，不管卖什么都能获得可观的利润。每当货柜一打开，货物就被购一空，一个货柜可以挣十几万美元。”据说当时每天早上，门卫拿着棍子站在店铺前面，控制顾客流量。晚上商家关起门来，都轻轻松松地数钞票。

       现在已经无法与以前相提并论了。随着华商大量涌入，分薄了市场的利润。为了减缓商家之间的竞争，各商店都尽量避免售卖同类商品。也有不少华商会主动降价，以至于部分商品价格跌至比中国的还低，进而造成恶性竞争。一些财大气粗，在中国有工厂的商贸公司，即使低价出售，还可以赚到中国的出口退税。

 “如果不能有效协调，再过3至5年，这块市场很可能被毁掉，以后生意会越来越难做。”这是某些华商心中的顾虑。无论如何，在这里做贸易还是有利可图，挣钱终归比中国容易。尤其是中国制造的小商品，无论是在城市或乡间都随处可见。

       现在，一些有实力的私人企业开始置地设厂，全速进军制造业。在地产业、旅游业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华人身影。随着华人人数的增长，华人旅馆、餐馆纷纷开业。大多数其业主都兼营其他生意，开设旅馆和中餐馆只是副业，主要是为了方便自己和其他同胞有个落脚之地。

       当地华人很自豪地说：“我们在这里创业没有对手，只有巴西人可以造成较小的威胁。曾经被葡萄牙统治过的巴西人，其文化类似安哥拉人。而华人的优势是吃苦耐劳，能够获得廉宜的材料和人力资源。”

       华人的到来的确让安哥拉受益无穷，不但充实了市场，推动了经济发展，也为当地建设了各项硬体设施。来自北京的陈老板说：“我来的时候，这里连扫把都没有，是华人引进并教会了他们用扫把。”

       从建筑业上看，华人的贡献更加不容质疑。在罗安达行走，无论是高楼大厦或是平民住宅，都有可能出自华人之手。安哥拉政府也乐于与华人建筑商合作，把一些学校、医院、体育场、公路乃至市议厅的工程都交给华人公司承建，因为当地官员一致认为：“华人建的不会倒，黑人建的容易倒。”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是华人在安哥拉生活的最佳写照。这个内战结束不久的西非国家显然并非华人的理想家园，但由于比中国更容易赚钱，所以看在钱的份上，他们再辛苦也愿意忍受。

       在安哥拉生活之艰辛，一下飞机便深深地体会到。入境处的办事效率很低，许多移民厅官员的英语不好，又不太熟悉电脑，在柜台磨蹭半天，让长长的队伍在没有空调的环境下焦灼等待。因此，在当地生活时间长的前辈们都一致认为在这里生活，最重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交通的紊乱与堵塞，必定让人摇头叹息。罗安达并非像许多人想像般的贫困破落，马路上触目所见，豪华轿车比比皆是。堵车情况严重，短短20分钟的路程，竟然要驱车三四个小时方能抵达。

安哥拉是一个消费极高的国家，然而，当地人的收入却完全追不上物价。这里的物价是中国的4至10倍，一粒鸡蛋就近一美元；平时在外面用餐，最便宜的也要20多美元。

       一套标准独立式房子的月租竟然高达3万美元，因此许多私人企业都“屋”尽其用，除了充当员工宿舍以外，还用来作为办公室。这样既可以免去舟车劳顿，且能节省上班路途被耽误的时间。

       高昂的物价，让当地华人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当地剪一次头发至少要20美元，而且手艺平平，于是一些华人打工仔便相互理发，从而节省了一笔可观的费用。有的华人甚至利用屋外的空地种蔬菜，自给自足，也从中获得不少生活乐趣。

       安哥拉高昂的生活费，令华人打工一族不敢到当地华人餐馆去享用。目前当地大约有十家中餐馆，无一不是“一掷千金”的高级餐馆。店内富丽堂皇，一家比一家装修豪华，如上海餐馆、吴家园、澳门餐厅等。

中餐馆以各自的特色来保持良性的竞争。例如吴家园就以“中餐西吃”为特色，即客人各吃自己所点的菜肴，而非像华人那样全桌人同享一样的菜肴。

       经过了数年的经营，熟悉了当地市场以后，一些中餐馆也已经开始扩建成宾馆，而且生意很好。

       安哥拉中国商会会长许宁说：“来这里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经商起步非常高，需要房子、汽车、翻译、保安等，如果没有超过百万美元的资金创业很难成事。”

       安哥拉的货币汇率不稳，这是当地华商常常面对的一大难题，有时候在短短的半天里便贬值高达5%，若长期这样便损失惨重。因此，华商每天傍晚都把白天经营所赚的钱拿到银行去兑换成美元。

       由于各种信用卡、电子结账的方式在当地不通用，所以现金成了唯一的支付形式，美元能够通行是外国人在当地的一大安慰。这让一些华商养成每次出门应酬，身上都带着数千到一万美元的习惯。

       或许当地的歹徒早已看准了这一点，所以华人常常成为他们打劫的对象。有的华人甚至被抢劫过好几次了，幸好一般都只是用枪恐吓，真正开枪的并不多。因此，身怀巨款的华人出门必须有车，否则十之八九将会遇到抢劫。

停电与酷热的天气，也给当地华人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三更半夜停电时常发生。虽说有发电机可以发电，但是华人一般都非常节俭，何况已三更半夜，忍一会儿又要起床工作，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在煎熬中渡过。

       安哥拉的蚊子很多，被叮咬后容易感染疟疾。就算是平时在户外工作，华工们都是穿上一身长裤长衣才敢出门，上衣的袖口也要用橡胶圈扎好。有时工地上的气温即使超过摄氏40度，他们也不敢轻易把皮肤暴露在外。

       另外，当地的卫生环境很差，很多初来乍到者未能适应而得病。由于在罗安达看病的费用昂贵，有的人甚至打趣地说，如果生病了坐飞机出国治疗，也比在当地医院看病要便宜。所以，他们看医生也只能找中医，要不然就自备药物。

       华人在安哥拉凭着无比的勇气、敏锐的投资眼光、艰辛奋斗的精神，很多都成功地开拓出自己的天地。但当地华人大多生活在自己的群体里，而没有很好的融入当地社会。

 在安哥拉，葡萄牙语是官方语言。倘若要真正融入当地社会，或者与当地人协调好关系，熟练使用当地语言是最佳途径。

       做生意时不管是谈价钱、订货、或是签合同，都需要用葡萄牙语。而大多数华商刚来的时候都不会说葡萄牙语，只能依靠翻译，与客户交流会受到诸多限制，日常生活中也因不熟悉当地语言而带来诸多不便。

       现在一般华资企业皆有聘请翻译员，如影随形般跟着老板或上司到处去谈生意。如果一直都离不开翻译，那么华人就很难融入当地社会，生意也很难扩大。因此，如何通晓当地语言，是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安哥拉以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当地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深，当地公司老板每到周末经常会在家里举办一些派对，邀请朋友或是政府官员参加，藉此联络感情，也可以培养人际关系。如果你不懂语言，完全靠翻译，就很难协调好这种交际关系。

       在当地投资，最不可忽视的就是法律问题。如果对当地法律一无所知，将会处处碰壁。在当地吃官司的华人事例不少，很多黑人就是利用华人不懂法律来敲诈华人。

 逢年过节，安哥拉的华人还是会像在自己家乡那样庆祝一番，只是庆祝形式简化许多，不是邀约三五知己好友、身边的同事一起大块朵颐一顿，便是出席由工作单位或中国商会、大使馆所举办的庆典，与同胞们一起度过。安哥拉的华人圈流行一种独特的“花生月饼”——花生炒熟之后碾碎裹上面粉烤熟。中秋时节华人就以这种月饼来应节。

       由于安哥拉的航空系统还不发达，中国和安哥拉的往返机票价格不菲。所以很多商户、派驻员都舍不得“轻易”回家“一转”，因此逢年过节时只能通过打电话或发邮件向家人报平安，有些商户甚至四五年都没回国探亲。

       华人通常生活在同族的圈子里。他们只与同胞共同欢度节庆；婚姻情况也一样，当地华人都是回国结婚，异族通婚的例子至今未闻。

       安哥拉首份中文刊物——《中文安哥拉》于2008年7月1日创刊发行，为当地华人生活增加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

 据创办人高阳解释：“《中文安哥拉》月刊之所以选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7周年当天创刊发行，为的是表达本人以及广大旅居安哥拉的华人‘心系侨社和谐发展，心向家乡繁荣富强，心寄祖国和平统一’的立场和愿望。”

       杂志以“集华文精粹，建和谐侨社”为办刊宗旨，旨在为旅居安哥拉的华人提供一份精神粮食，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中文安哥拉》彩色印刷，于每月中旬出版。内容涵盖全球华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是2009年前安哥拉唯一的中文刊物。

       高阳创刊时最初的设想，源于北京奥运火炬在某些国家传递时遭遇藏独分子破坏和一些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的报道。他认为：“应该让海外生活的华人有机会了解祖国，并通过海外同胞与当地人民的交往，祛除偏见，让华人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同时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

       为当地华人服务的还有安哥拉中国商会。它由华商许宁于2004年成立，目前会员人数已经达到200多人。商会是华商经济进入成熟阶段不可缺少的组织。

       商会的宗旨是维护当地华人的利益，促进华商间的团结。另外，对于许多初来的投资者，安哥拉中国商会无疑也扮演着灯塔的角色，为他们指引一条正确的投资道路。

       中国商会是当地目前唯一的社团组织，谈到当初成立时许会长感叹道：“当时的安哥拉华人共有两万多人，却始终没有一个团体组织来为华人服务，我会成立后许多华商便加入进来。”

在首都罗安达的市中心，有一个最大的商品批发集中地圣保罗市场（San Paulo Market）。这里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舒适的购物环境，取而代之的是拥挤的店铺和泥泞的道路。市场里店铺大约100多家，多数是做仓储贸易的华商，每日艰辛打拼，日复一日地为当地百姓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不少华人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白手起家，至今都已家财万贯。

       2002年安哥拉内战结束之前中国人不足200人。他们大部分都在这水泄不通的市场里做买卖，因货物十分畅销，许多商品能赚取十倍的利润。

       圣保罗市场的卫生条件极差，初次来的人都难以忍受那种难闻的异味，不过时间长了便会习惯。

       在这里卖小吃的小贩都把食品原材料放在垃圾堆上，仿佛那是天然餐桌。垃圾堆旁，一位身穿长裙的黑人妇女就地站着小解，身边的人一副司空见惯的表情。稍稍留意，有些女顾客还从胸罩或内裤里掏钱买东西。这些行为在这里看起来就这么理所当然。

这里的治安是商户心头之忧。凡在圣保罗市场做生意的华商，都有被抢的经历。在这里做了7年多服装生意的沈阿姨说：“这个市场环境非常复杂，是个龙蛇混杂的地方，盗窃和殴斗更是屡见不鲜，顾客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因为他们都已经习惯、麻木了。”直到安哥拉中国商会成立，华人的安全才有所改善。

       目前，华商虽都抱怨钱越来越难赚了，但是华人依然前仆后继。或许不可预知的因素太多，他们的生意一般都不敢做得太大，而且店面也不会花太多的心思去装修。一盏灯泡悬挂在店铺中央，没有上漆的木板柜台，墙上安置几个摇摇欲坠的货架，再请几个黑人员工，这样便可开张营业了。

       华人在安哥拉经过近30年的拼搏，总算立稳脚跟。渐渐地，圣保罗市场已经不能满足华人的需求。在罗安达市边缘的一个新发展区——维也纳，最近也建立起类似的大型市场，于是华人开始转移阵地，纷纷到那里去分一杯羹。

在蓬勃发展的安哥拉，华人就像一批幕后的工作者，虽然在大街小巷不常看到华人的身影，但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活跃在各个领域，默默地把安哥拉推向世界的舞台。

尼日利亚因尼日尔河而得名，南临大西洋几内亚湾，2000多年前就有了较发达的文明，享有“黑非洲文化摇篮”之美称。当地天然资源丰富，是非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亦有“天府之国”的别称。

       然而，富饶的资源并没有让尼日利亚的人民生活如意。20世纪初，尼日利亚沦为英国殖民地，1960年独立，之后内乱不断，至今尼日利亚大部分人民的生活还处于贫困状态。

       处于如此恶劣的经济环境，华人依然凭着勤劳与智慧在尼日利亚闯出了一片天地。

根据英殖民帝国对尼日利亚人口的记载，在1931年，曾经有4名华人抵达尼日利亚。不过，他们在这里逗留的时间不长，所以，对于他们在尼日利亚境内的活动详情，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记录。

       华人正式登陆尼日利亚，则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后期。当时，有一批香港人到此开办工厂，凭着刻苦耐劳的精神，以及极佳的诚信，他们很快便获得当地政府的信任及支持。

       在60年代初取得独立之后，为了发展国家的经济，尼日利亚政府也曾经派员专程到香港去招商引资。根据记载，截至1965年为止，在尼日利亚的华人至少有200多人。

       起初的时候，华人移民一般都经营搪瓷业，或是开设纺织厂、火柴厂以及中国餐馆等。那时，尼日利亚的4家搪瓷厂全部都是由华人所经营，因此，在这里，搪瓷业一直被视为尼日利亚华人发迹的老本行。

       早期的华人企业家朱南扬、查济民、沈文伯等，都是当地响当当的人物。直至今日，这些华人在尼日利亚的企业界仍然享有极崇高的名望。

       60年代便已经到尼日利亚来投资的朱南扬，在这片土地上开创了他的企业王国，甚至因此而被封为“伊克贾工业区酋长”。

       沈文伯则是尼日利亚的首名华人公民，而且也是第一批到尼日利亚来投资办厂的先驱。1959年，沈文伯和数名朋友一同来尼日利亚打工，起初的好几年他都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直至稍有积蓄时，便与数名香港朋友合伙建厂，结果成功打下了一片江山。

       在拉各斯（Lagos）机场前往伊克贾区（Avenue Ikeja）方向不到10分钟的车程，途中会见到偌大的“华亨”二字出现在一家工厂的墙壁上。这家在尼日利亚注册的香港企业创办于1963年，经历过数十年的风风雨雨，实力依然雄厚，在当地几乎可说无人不晓。

       起初也是以经营搪瓷业起家的华亨，如今还生产纸箱、电缆及瓦楞铁等，为尼日利亚市场提供了大量价廉质优，并且印着“MADE IN NIGERIA”（尼日利亚制造）的产品，同时，也为当地人提供了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

       后来，由于尼日利亚开始陷入内战的纷扰，很多在尼日利亚投资的华人都暂时迁入西非的加纳或贝宁等地。直至1979年局势较为稳定之后，加上尼日利亚的石油经济快速发展等因素，许多华人于是卷土重来，很快地华资企业的数量又回升到40多家，而华人人数也增加到1500人左右。

       随着80年代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大陆移民也陆续到来。

       在90年代中叶，西方国家以人权作为借口，对尼日利亚进行全面的经济制裁，导致不少外资企业纷纷撤资，然而中国商人却本着人弃我取的精神，涌入尼日利亚去投资兴业。

       而今，在尼日利亚的华人已经超过7万人，其中中国大陆移民占大多数。这些华人当中，约有5万人集中在有“西非纽约”之称的拉各斯，其他华人则分布在首都阿布贾、卡杜拉（Kaduna）以及贡贝（Gombe）等城市。

  相对于非洲其他国家的华人来说，尼日利亚的华人已经不算是非洲的“新客”了。从当地人口比例上看华人虽少，但在当地人眼里却并不陌生，更理所当然地认为华人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只是由于文化差异，生活习惯不同而已。

       在尼日利亚华社中，最有名的4家企业被称为“四大家族”。他们来自港台地区，在尼日利亚已扎根大半个世纪。

       这四大家族分别是董氏集团，拥有数十家工厂，上万名员工；查民集团，具有“西非纺织王国”之美誉；李氏集团，从事塑料制品和钢铁的生产及销售，年产2亿双拖鞋，占据尼日利亚90%拖鞋市场；以及华享（陈氏）集团，以搪瓷业起家。

       四大家族一般拥有数家不同的工厂，生意趋于多元化，有的在世界各地还有投资。对他们而言，尼日利亚始终是一个无穷尽的宝藏，尽管艰辛还是愿意永驻此地。

       现在，他们的生意都已交由第二、第三代接手管理，第一代的创业先驱大多已经移民到其他比较先进的国家颐养天年。

       目前，当地华人企业大大小小已超过300多家，主要从事商贸批发、制造业和通讯业，而且数目还在不断上升。贸易公司多达270家，已成为推动尼日利亚经贸发展的一支生力军，其他则从事石油勘探、路面维修工程、饲料加工、纺织工厂、开中餐馆等。

       “只要能赚到钱，其他方面简单一些，生活清苦一点也没关系。”这是大部分尼日利亚华人的心声。

 近几年来，尼日利亚政府大力鼓励外资，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如免税政策、简化程序手续，以及提供良好的软硬设施等。

       除了优惠政策外，华人当初选择尼日利亚，也因到尼日利亚来的门槛较低，这里的商务签证也特别好办，不需要资产保证、繁复累赘的手续和漫长的等待。

       这里不仅是大企业鸿图大展的地方，也为有志年青人提供了很大的创业空间。

       一些来自中国的大企业集团，纷纷在当地投资发展。其中，最有名的两个项目便是占地约30平方公里的莱基自由贸易区，以及占地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尼日利亚奥贡广东自由贸易区（Ogun-Guangdong Free Trade Zone）。这些注资数十亿美元的经济贸易区是华人在当地投资的百年事业，由此可以看出华人对尼日利亚充满了信心。

 9年前，刚踏出大学校门的车超和几个年轻的伙伴怀着梦想与热忱，来到尼日利亚开创自己的事业，创立了Cway——尼日利亚著名的饮料品牌。它是当地目前规模最大的现代饮食企业集团，集纯净水工业化生产，新型饮水科技的开发、应用以及天然果汁饮料、运动健康饮品开发及生产于一体。

       创业当中虽遇过不少困难，但他们还是挺了过来。Cway创办人之一的张先生说：在当地创业有三大要诀，第一需就地取材；其二选择用电量较少的行业；最后是聘请黑人员工尽量不要超过50人，因为当地劳工法规定50人以上便能成立工会，到时候便会提出诸多要求，一旦被拒绝，就可能酿成示威、罢工运动。

       张先生还自豪地说：“Cway就是China way（中国路）。我们成功地把卫生和健康的理念带来这国家。这里水质很差，开始卖矿泉水时，当地人还以为瓶子里装的是油，是我们教会他们饮用纯净水。”

       在尼日利亚，只要对当地的社会状况有所了解，建立一定的人脉后，开拓新的商机并不难。

目前，拥有两艘价值40多万美元、540马力渔船的穆瑞红轻松地说：“当初是从海产业开始起家，后来因机缘巧合，获得当地官员的协助，就这样投入了捕鱼事业。”

       在距离中国千里之外的大西洋上，有20余条中国渔船，200多名华人渔夫驻扎在拉各斯港口从事捕鱼业。据说这些华人渔夫早在五六年前，因尼日利亚政府颁布的优惠政策而不辞万里到这里来捕鱼。

       对于这些中国渔民来说，每天在船上度日，一出海便是好几个月，所以在尼日利亚或在中国捕鱼都是一样。随船出海捕鱼多年的老徐说：“同样可能会遇到海盗，睡的地方一样是简陋的船舱，每一餐皆是粗茶淡饭。不同的是，所捕到的鱼种不一样罢了，报酬也会比国内高一至两倍。”

       虽然尼日利亚政府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但华人仍然没有安全感。当地政策时常朝令夕改，使华人无所适从。在工厂当管理员的陈东尼遗憾地说：“来盖厂时说过头5年免税，谁知道还不到3年就改了，规定要缴足税金。”

       对于政策变更问题，华人一般都逆来顺受。留下来的华人都已经习惯，也能想到应对之策。忍受不住的人，多数回国或移民他国。

* *在尼日利亚拉各斯的伊柯贾区（Avenue Ikeja），有一条以香港在此地注册的企业——WEMPCO(董氏集团）来命名的道路。该公司在当地有十来家工厂，雇员超过1万人。它拥有尼日利亚最大的木材加工厂，其经营的建材当中，瓦楞铁的市场占有率超过95%。*

华人在尼日利亚著名的集中地有龙城、金贸商厦和尼日利亚大厦等几个规模较大的中国商品批发销售中心。这里尽是黄皮肤脸孔，带有各地口音的普通话此起彼落，绝不会有身在异国的感觉。

他们批发或零售从中国大陆运来、价格低廉的货物，为尼日利亚缓解了物资匮乏的窘境。一名店主说：“在这里，手机曾经是叫价几十万奈拉一部，现在只卖一千奈拉。没中国人的到来怎么成？”

       开电器店的黎英君表示：“这里钱容易赚，黑人出手阔气，理财能力差，一个月的工资有时候在发薪的第一天便花光了。61寸的液晶电视，我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都还没有卖出一台，在这里已经卖出了好几台。”

       当地人特别注重自己的外貌，可是他们却偏偏天生一头短卷发。黑人都很舍得把钱用来买假发，一顶假发的价钱相当于他们大半个月的工资。他们的钱财通常左手刚进，右手便花掉，是典型的“月光族”，所以善于经商的华人，生意一直都很好。

       尼日利亚电力设施的建设速度严重落后于工业发展，导致每天至少停电四五次。当地人大部分时间都活在没有电力供应的状况下。

       冲凉、上厕所中途停电妨害不大，但在这个炎热的国度里，一旦没有电源启动冷气或电扇，将会彻夜难眠。有的初来者没预先准备蚊帐，则会受到蚊虫的侵袭，夜夜苦不堪言。

       在这种情况之下，华人几乎每家每户都拥有自己的发电机。家里有保安的，在停电时都由保安启动发电机，没有保安的就得自己动手。

精明的华商认为，当地的某些不足就是商机。缺电成了电器店老板黎英君眼中的一个宝贵机会，目前她正在推出太阳能电灯，并深信这产品在当地将大受欢迎，成为中上阶层家里不可缺少的用品。

* *在一些华人所开设的超市或商店面前，经常可见到一名穿着光鲜整齐的黑人在门口徘徊，要不是他那一身华丽的装束，许多人会误把他们当作看门或看车的。其实，他们都是店主聘请的“经理”。“经理”的工作是“减少麻烦”，不论是地痞流氓，或是政府官员，都由他来负责出面交涉。*

在尼日利亚的华人，除工作以外生活十分枯燥，尤其是为安全起见，一般都足不出户，没有多少娱乐可选择。

       华人的娱乐，除了赌博，便是上网或看电视。中国大陆的中央第四台、台湾的TVB8、ESPN体育台和香港的天空卫视等中文电视台都是他们生活中的“良伴”。长期在当地参与石油探勘工作的庆先生说：“现在有了卫星收视天线，选择的频道也多了，节目丰富且都很精彩，体育节目24小时滚动播出，新闻节目也是全天候的，为当地华人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

       华人无论走到哪里，还是以饮食为先。聚集在一起小酌三两杯，闲聊生活点滴是当地打工仔们在忙碌一天后最喜欢的事。在伊柯贾区有一家周姐火锅店，在当地华人圈里大有名气。家庭式的装潢让人倍觉亲切，食物也是家常风味，价格又相对大众化，成了打工华人聚餐的首选之地。

       一些高档中餐馆则是尼日利亚高官显贵摆排场的场所。目前，在拉各斯的高档中餐馆有20多家，每一家都气派非凡，如翡翠楼、明珠楼、翠蝶轩等，装饰富丽堂皇，气势十足，食物色香味俱全。就连餐馆里的黑人侍应生也一身笔挺的制服，看起来英明神武。

       从这些高档次的中餐馆可反映出当地贫富悬殊。顾客都是一些身份显赫，非富则贵的高官显要，他们“简单”的一顿晚餐费用，相当于一般百姓家庭数月的收入。当地高官显贵对中餐非常喜爱，尤其钟爱粤菜。每当有什么特别的宴会或聚会，中餐馆绝对是他们首选之一。

       试问中餐如何？他们会竖起拇指说：“Chinese food，No.1”（中餐最可口）。

 尼日利亚目前虽无华文学校，但华人社团组织却不少。当地主要华人社团组织有尼日利亚和平统一促进会、中尼华人商贸企业协会、尼中友好协会、中国工商联合会等。

       当地社团组织的成立，主要是为了促进华人之间的团结、与当地人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以及确保华人的贸易能够顺利进行。对于各个华人社团与组织的成立，当地华人都表示欢迎。尤其是针对中尼华人商贸企业协会和中国工商联合会的创立，其中的一名会员说：“这里的华商时常因商业利益而导致冲突，商会的出现可以起调解缓和的作用。”

* *在尼日利亚华人当中先后曾经出现十多位尼日利亚的酋长，其中较为有名的有胡介国、房一波和朱南扬等人。受封为酋长的标准是对当地社会有极大的贡献，并获得社会各界的良好口碑。今日的酋长是一种荣誉和社会威望的象征，且还享有诸如本国内的逮捕豁免等特权。*

       在文化组织方面，据说当地还有一所尼日利亚中国功夫联谊会，令人振奋的是，这个联谊会是由尼日利亚人十多年前创立的，以学习、宣扬中国功夫文化为宗旨。会员当中，有不少人的偶像是李小龙、成龙和李连杰，这足以说明中华文化逐步融入当地社会。

       在媒体方面，2005年首次发行的《西非统一商报》，虽然只有16个版面，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报道内容包罗万象，涵盖了政治、经济、娱乐、休闲、广告等各个方面，而且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可读性，广受当地华人华侨的欢迎。尤其在与大陆的《新民晚报》、《今晚报》以及新华通讯社合作后，如虎添翼，发行量也激增。

       《西非统一商报》的诞生顺应了华人经济在尼日利亚和西非各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当地华人精神粮食。目前，大部分华人是改革开放后来到尼日利亚，他们都渴望从华文报纸中得到祖国、家乡的信息。

       华人销售经理丁权说：“目前《西非统一商报》是当地唯一的中文报，它提供了华人所需要的信息。许多人买报纸的主要目的是看广告。一份报纸十人传阅是这里常见的现象。”

 虽然华人在尼日利亚已超过半个世纪，却没有完全真正地融入当地社会。不过，在当地生活时间较长的华人，对当地民风非常了解，懂得与当地人相处，并包容他们的缺点，欣赏他们的优点。在尼日利亚生活近20年的薛晓明说：“在这里，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非常重要，有时候要从他们的角度去思考，学习当地文化。”

       来自广州、在当地做会计师近十年的梁女士认为：“其实，要立足当地，归根结底，还先得从自身做起。比如华商们必须确保自己货物的品质，建立良好的信誉，提高顾客对华人的信心。同行之间不能以削价来恶性竞争。商人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尽量不授人以把柄，让黑人有敲诈的机会。”

       “个人方面则应该确保合法居留身份，尽力提升本身的素质，如学好英语、对当地的法律、文化、习俗都要有一定了解。行有余力时，应该帮助当地的弱势群体，实践‘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崇高价值。”梁女士认真地说。

尼日利亚虽然没有一条典型的唐人街，却有两座同样充满了中华风味、华人聚集的堡垒——龙城，其功能和意义与唐人街并无二致。当地华人把较早建成的叫作老龙城，最近新建成的则称为新龙城，新龙城的规模是老龙城的4至5倍。老龙城已为人们所淡忘，现在人们口中的龙城其实就是指新龙城。

       龙城位于拉各斯，占地约十多亩，以寨城式的中国风格建成。其围墙形状模仿万里长城，气势非凡。雕塑龙头的飞檐翼角以及巨大厚重的拱形大门，风格与当地建筑迥然不同。龙城中间的一个宽阔院落用作停车场，它一共有200多家批发和零售店铺，售卖着各类中国来的产品。除此之外，还有餐馆、赌场、诊所、仓库和住宅等。

       这里人气旺盛，每天早上9点大门一开，替华人打工或是来购物的黑人们一涌而入。随之讨价还价声此起彼落，龙城里外人头攒动，热闹沸腾。

       龙城是华人聚集的地方，在此，华人能感受到在国外，人人所渴望的一种归属感。然而，龙城也是最“危险”的地方。每当执法人员想敲诈华人，龙城便首当其冲，逮捕、索贿、搜查等行动把整个龙城闹得鸡犬不宁。

 尼日利亚丰富的天然资源及良好的经济潜能，是华人留下的最大理由。尽管当地的生活环境不算好，可是华人天生就懂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道理，他们逆境求存，数十年来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而这块商机无限的土地也给予了他们丰厚的回报。

       渐渐安定下来的华人，也开始对当地社会有所回馈。

位于非洲东部的肯尼亚，赤道横贯中部，东非大裂谷（Great Rift Valley）纵贯南北，素有“野生动物王国”的美誉，30多个动物自然保护区占了国土面积的15%。

       这古老而神秘的国度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早在1400年前，东南沿海地带已形成一些商业城市，阿拉伯人开始到这里来经商和定居。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占领了沿海一带。1890年，东非遭英国和德国瓜分，肯尼亚被划归英国所有。直至1963年12月12日，肯尼亚才宣告独立。独立后肯尼亚的发展相对稳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之一。

       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被誉为“阳光下的花城”、“东非小巴黎”，这里四季如春、空气清新，非常适合人类居住。习惯于埋头苦干的华人，到这里后都学会了享受舒适的生活，拥抱美丽的大自然。

600多年前，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行程里，有4次在肯尼亚的蒙巴萨（Mombasa）、马林迪（Malindi）、拉穆岛（Lamu）留下了足迹。而且，他还将一批当时被称作“麒麟”的祥瑞之兽——长颈鹿带回中国去，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至今，关于郑和船队当年在非洲有留下后裔的说法也一直不绝于耳。这种说法吸引了许多海内外的媒体竞相登上肯尼亚东部的拉穆群岛进行探访，最后发现在帕泰岛（Pate）上有一个人数不多的民族——“法茂族”，自称祖先是中国人。

       他们世世代代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

       在数百年前，一些中国水手和非洲部落藩王们曾有过多次贸易来往。有一次，一艘中国船在帕泰岛东岸触礁遇难，水手们带着船上的陶瓷及其他货物一同游上岸。安顿下来之后，他们娶土著女子为妻，并将村子命名为“上加”（Shange），据说便是上海（Shanghai）的谐音。

       相传这些水手就是郑和船队的水手。不过，这段历史仅靠当地人口耳相传，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文字记载。

       至于近代华人前来肯尼亚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上世纪40年代，当时就已经有一名叫田纷的香港人在这里经营中餐馆。

       到了五六十年代，除了香港移民，大多数到肯尼亚来的华人都是从毛里求斯、留尼汪或南非等地再移民过来的。

       在20世纪后期，越来越多华人涌入肯尼亚。以上海人居多的中国移民，大部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纷纷前来寻找商机的，且以开餐馆为主；台湾的小商人，则是因为响应政府当年援助中小型企业的政策，而到肯尼亚来开拓事业，他们大多从事与科技有关的贸易如售卖电脑零件等。

 如今，在肯尼亚的华人有一万多人，主要分布在内罗毕和蒙巴萨等地。一般老移民多开设中餐馆或投资房地产；而新移民占了大多数，主导着整个肯尼亚华社。他们对祖国的眷恋之情仍深，据说只有十多人入籍肯尼亚。许多新移民除了参与国企的项目如建筑工程、资源开发外，还参与一些援建工作；私人企业涉及最多的则是贸易、旅游、资讯、中餐馆和海产业等。

       肯尼亚并没有像其他非洲国家那样因发现丰富的天然资源而成为“暴发户”，国家经济成长突飞猛进。它的发展相对平稳，给人的印象就像一个老实的民工，每一天踏踏实实地过活。

       但经济缓慢发展，治安不靖，也不禁让一些华人动了离开的念头。新移民何民江说：“我来了30年，这里都没有什么变化，现在中国强大了就想回去发展。”

       新移民也面临印度人的挑战。早在两百年前，印度人便已登陆肯尼亚。捷足先登的印度人在各个行业都占尽了先机，而且基础非常稳固，外来人实在不容易分一杯羹。因此，后来的华人可发展的领域也就大大地打了折扣。

       尽管困难重重，华人依然秉着见缝插针的精神，在各行各业钻进忙出；同时，他们也努力融入，意图在这不同肤色的国度里创造自己的“快乐天堂”。

 肯尼亚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它不但是动物的天堂，优美的自然环境和种类繁多的奇珍异兽也使它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一年一度的百万角马大迁徙更被评为世界新七大奇观之一。每年都有许多热爱大自然的人士千里迢迢地到这里追寻自己的梦想。这使旅游业成了肯尼亚仅次于农业的第二重要经济支柱。

       目前，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到这动物王国来观光，对肯尼亚的旅游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增长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肯尼亚华人一个主要的特点是经营旅行社的特别多，目前已经超过十家，其中不少还兼营旅馆。

       这些华人经营的旅游社一般都拥有自己的宾馆、观光车，还有用华语解说的导游，并为中国人量身定做了适合他们的旅游行程，让他们尽兴而归，不必为陌生的语言和环境所苦。

旅游资源丰富的肯尼亚，让华人也积极投身旅游业，带着从家乡远道而来的旅客一览这里的动物王国。（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当地经营了数年以后，旅行社的生意也逐渐拓展到肯尼亚的周边国家如坦桑尼亚、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等，为中国游客寻找探索非洲的下一个目标。

       在肯尼亚当导游，并不是一件“简单任务”。“走进非洲”旅行社的导游韩方旭透露：“在这里当导游的，除了要在景区给游客介绍讲解，同时还要兼任司机；回到宾馆，还得为住客们准备餐饮，身兼三职。”虽然工作辛苦，但他还是非常享受能够亲近大自然的生活，并愿意长期留在此地。

       是的，身在当地的华人又怎么会错过置身于茫茫草原间，观赏万兽齐聚的机会呢？只要自身的经济条件不是太差，留在肯尼亚的华人都会定期到肯尼亚的各个旅游胜地去观光，而且百去不厌。这也是他们喜爱肯尼亚，愿意逗留在那里的原因之一。

 中国被誉为“世界工厂”，中国人自然而然地便成了“世界推销员”。他们的足印已经遍布肯尼亚各个城市小镇，在很多的商店里都可以见到印有“中国制造”的商品，从纺织品到电子产品，还有各种塑料制品、陶瓷器皿、建筑材料等，无所不有。

       这些商品大多价格廉宜，弥补了当地物资的匮乏，深受民众欢迎。肯尼亚的发展程度不如中国，但当地很多进口商品的价格都远高于中国，并非一般民众所能消费得起的。因此，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在提高当地的中下阶层百姓的生活素质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2003年是中资企业进军肯尼亚的一个里程碑。中国新科技和新商品开始登陆肯尼亚，并在那里占据了一定的席位。嗅觉一向敏锐的华商，凭着顽强的生存能力和斗志，像一群群的蚂蚁，辛勤地筑起一个个蚁窝。如今在内罗毕的一些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挂着中文招牌的中国小商店。

祖籍海南，当年因为公干而前来肯尼亚的冯辉，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在肯尼亚开创了自己的陶瓷和建材生意。目前他在肯尼亚几个主要城市开设了6间分店，同时还把生意拓展到周边国家。

       对冯辉来说，在这里创业经商最大的难处是语言障碍和贪污腐败盛行。幸好呆久了以后就懂得了应对之策。他说：“最重要还是奉公守法，一切按着规章办事，这样便万无一失了。”

       除了商贸领域，肯尼亚华人在建筑业方面也积极参与。目前在当地承建工程项目的中资企业共有十多家，在建项目近50个，合同金额高达十多亿美元。工程承包领域从传统的公路、房建扩展到咨询设计、石油管道、供排水设施、机场扩建、电力改造、地热井等。

       华人的确给当地做出了许多贡献。自1964年以来，中国向肯尼亚提供60多项援助，包括建造体育馆、农村电信网发展、修桥铺路、电力水务等基建工程等。

       除了贸易、建筑业和旅游业，饮食业算是另一个在当地开花结果的行业。离乡背井的华人，无论去到哪里，饮食文化总是如影随形。

       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第一批到肯尼亚的华人中，有许多便是靠开餐馆起家，至今已由第三代后裔接手。现在，仅在内罗毕就有40多家中餐馆，而且还有不少是“老字号”，如天天酒家、龙珠饭店、九龙饭店等。这些招牌别说当地华人，就连黑人也耳熟能详。

       肯尼亚中餐馆的一大特色是聘用黑人厨师来掌厨，而他们在厨艺方面也确实颇有天分，一般的家常菜如糖醋里脊、清炒时菜、蒸鱼、炖汤，都煮出了相当地道的风味，获得当地人的喜爱。

 80年代前来肯尼亚当厨师，如今已成为九龙饭店老板的何民江说：“从国内申请厨师过来工作不容易，手续又复杂。而且这里的生意以当地人为主，给他们煮正宗的中国食物，有时候很难迎合他们的口味。所以我们就干脆实行本土化，不但可以降低成本，而且还受到当地人的欢迎。”

       虽然如此，一旦有华人顾客光临，老板还是会亲自下厨，为他们呈上一道道地道的中国菜肴。

* *由于这里蔬菜价格昂贵，一些华人专门到当地附近的人家，租用他们的土地来栽种蔬菜。所获的蔬菜不但可以供自己享用，多余的还可以用物物交换的方式和当地人交换一些蔬菜水果。华人回乡时也会带些小玩意过来，当地菜贩们觉得稀奇的话就会很乐意用一堆黄瓜、青菜等来交换。*

肯尼亚虽然位于赤道之上，但是由于其海拔较高，因此这里的气候暖和，平均温度在摄氏15至25度左右，非常适宜人类居住。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让联合国人居署和环境署都选择在这里设立总部。

       令人如沐浴春风的舒适环境，也是当地华人喜爱肯尼亚的最大因素。

* *肯尼亚政府已经批准在蒙巴萨市中心划出3000平方公尺空地供华人建郑和塑像和纪念碑。郑和塑像和纪念碑的建造费用将由在肯尼亚的华侨华人、中资企业捐献，以给世人及肯尼亚华人的后裔留下一座永久性的纪念建筑。*

这里的空气非常清新，不但让人过得舒服，也活得健康，连皮肤都可以获得最天然的保养。新来的华人往往只需要两三个月便能够适应下来，住久了也舍不得离去。

       内罗毕被誉为“阳光下的花城”，一年四季鲜花怒放，不管室内室外都是花团锦簇。这里的花价非常便宜，颜色特别艳丽，而且花的寿命也比其他地方来得长。

       肯尼亚没有发生过排华等不愉快事情，相反地，这里还有不少华人与当地人通婚的例子。肯尼亚华人和当地人相处得非常融洽。黑人们都喜欢华人，尊重华人。

       一些当地人对华人有了一定的好感，还进而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产生了兴趣，并积极地学习汉语。如今许多肯尼亚黑人都会讲几句简单的汉语，每当遇到华人，他们都会主动用汉语打招呼。

       肯尼亚华人除了醉心于动物王国的探险之外，平日的休闲活动也相当精彩，或在室内高歌，或在室外野餐，或守在电视旁观看家乡的变化。

       虽然在人们的印象中，内罗毕是非洲的贫穷城市，但这里房租异常高昂，没有1000美元，很难租上一间好的房子。老移民的住宅一般都是比较豪华的别墅，位于别墅区内。他们早已打算在此“长期作战”，因此屋子里的家具设施一应俱全，也富有中华特色；新来的华人则多住在由公司为他们租来的公寓，由于只是短期逗留，所以设施较为简陋。

       为数不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华人则因为语言和文化上比较英式化，因此生活方式也略显不同。他们的生活圈子突破了本族范围，拥有特别多的外国朋友，也可以没有隔阂地融入当地的主流生活。

       说到娱乐，当然不得不提赌场。内罗毕市内到处都是赌场，规模不大却五脏俱全。以华人在肯尼亚的人口比例看来，赌场里的华人算是极多的了。不少华人在赌场里输得倾家荡产，最后连房租、水电费都交不起。

在肯尼亚，由一万多人组成的华人圈子虽然不大，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华人彼此之间都很团结，比方说肯尼亚众多的中餐馆和旅行社虽难免会出现竞争的情况，但是大家都尽量保持各自的特色，始终以包容之心来维持着良性竞争。

       肯尼亚的华人组织屈指可数，不像其他非洲国家充斥着许多“华而不实”的团体。这里最具有代表性的团体要数肯尼亚华人华侨联合会和肯中经贸协会，它们在这里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肯尼亚华人华侨联合会成立于2005年1月8日，是肯尼亚华人成立的第一个组织。会长韩军指出：“华人在肯尼亚是‘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的组织，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对开创一番事业是有必要的。”

       华联会常在各大传统节日如农历新年、中秋节举办欢庆会，让肯尼亚的华人排除了身在异乡孤苦的感觉。

在肯尼亚，家家户户的华人手中都会有一本如何保护自身安全的小册子，里面详细地写明了各种应该采取的防范措施和一些曾经发生过的案例，以供当地华人参考。原来，这便是华联会为了华人的人身安全而费心准备的“秘笈”。这小小的本子成了当地华人到肯尼亚各处都必定携带的防身之宝。

       同时，华联会也联同中国大使馆、经商处、新华社等出版《华声报》双月报刊，为肯尼亚华社填补了华文媒体方面的空白，而且这份刊物还是免费派送的。

       这一份精美的报刊，主要为华人报导关于肯尼亚、当地华人社会以及中国的新闻，当然也少不了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报刊上的广告也被当地华人视为“小黄页”，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若觉得两个月才发行一份的平面媒体无法满足生活上的需要，那华联会每天传送到各个会员电子邮箱的网络报——《非洲之声》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

       2006年初，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在肯尼亚开设了海外第一家调频广播电台（CRI97.9FM）。每天播出19个小时的英语、斯瓦希里语和华语节目，不但为当地华人带来了丝丝的亲切，同时也为肯尼亚人民了解中华文化打开一扇窗口，也将为两国之间开创更多交流领域。

 肯尼亚也是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慈善团体、援非组织的驻扎地。不少援非计划都从这里出发，推进至非洲各国各地。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也随着各自的组织如中国信徒布道会，世界华人福音事工团体前来肯尼亚投入施援工作，包括开办学校、孤儿院，派发救济品等，并长期居留于斯。

       例如，在内罗毕市的远郊地区，有一家由新加坡华人于1992年开办的孤儿院。目前，该孤儿院里共收养了200多名孤儿。在这个避风港里，孤儿们不仅衣食无忧，还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创院的女院长为人低调，她的善举虽然被媒体报导得不多，但是在肯尼亚待久了的华人都知道这一段华人社会中的佳话。

       在肯尼亚行善乐施的不仅仅是宗教团体或慈善机构，华人企业也当仁不让。2007年12月，因肯尼亚反对党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而在当地各处爆发大规模骚乱，造成了一千余人死亡，无家可归的人数更高达30多万。华资公司纷纷慷慨解囊，其中中国路桥公司和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肯尼亚分公司分别向肯尼亚红十字会捐助15吨和6吨的玉米粉，援助在骚乱中流离失所的难民。

子女的教育问题是肯尼亚华人家长极为关注的事情，尤其是母语教育，更是他们最大的忧虑。

       在肯尼亚这个实行英国教育体系国家，基本教育还算完善，而且联合国所驻属的内罗毕还有多所不同源流的国际学校供选择。在肯尼亚生活了十多年的陈发曾想过举家回国，但后来担心孩子的教育难以和台湾的体制接轨，经过认真的权衡分析后，还是决定留下来。

       至于华语教育，则因目前的华人人数太少，而无法开设华文学校，因此，家长们惟有身兼师职，趁着晚上空闲时，亲自教导儿女们一些华文知识。至于那些终日为生计所困的家长就得自聘补习教师，来补充子女们华文“养分”。

       无论如何，正规华文教育的缺失，是肯尼亚华人的一大隐忧。在当地出生的第二、第三代华人虽然使用的是华文名字，不过他们已慢慢地被西化，融入了当地社会。

相对于非洲其他国家的华人，肯尼亚的华人是让人欣羡的一群。虽然这里没有像南非那样规模庞大而完整的华社，也没有南非那样广阔的发展空间，但这里安稳平静的生活也是南非华人所求之不得的。

       但时候到了，华人也会为去留的抉择而苦恼。留下，可以在这四季如春，风景优美的环境中生活；离去，则为了飞往商机更蓬勃的国度去，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

       无论如何，来过肯尼亚的华人肯定永世都不会忘记这里的美好。肯尼亚辽阔的草原，还有草原上奔驰的兽群，都将永远是他们心中最美好的记忆。

埃塞俄比亚（简称埃塞）位于东非，全国平均海拔近3000公尺，素有“非洲屋脊”之称。由于当地历法把一年分为13个月，且该国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阳光普照的好天气，故又被世人称为“享有13个月阳光的国家”。

       这个以农业为主的贫穷国家虽然幅员辽阔，但是真正适宜务农的土地却仅有10%，且常年干旱，连年歉收，不时发生饥荒、饿殍遍野。然而，有时候老天爷却喜欢和这里的老百姓开玩笑，平时晴朗的长空会突然变色，暴雨连绵，不但把少得可怜的庄稼摧毁殆尽，还造成不计其数的伤亡和损失。

       世上喜欢喝咖啡的人很多，但是知道埃塞是咖啡的原产国却无几人。咖啡是该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占出口总收入的60%以上。喝咖啡也是当地人的一种文化，他们对喝咖啡十分讲究，丝毫不马虎，有点像中国或日本的茶道。

       埃塞在国际上的地位并不高，但是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和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却名声响亮，甚至被称为非洲之光。若要到北非或西非的各个国家，一般都需要乘搭埃航在亚的斯亚贝巴机场转机。因此，许多到过非洲的华人都曾路经此地。数以万计的华人更是从这个机场涌入埃塞，在这里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早在40年前，就已经有一群来自中国北方的华人在埃塞展开了拓疆之旅，他们当中主要是河北人。然而，在今时今日，这一批为数不多的华人先驱经已逐渐隐没在新一代华人人海中。

       埃塞的第一波华人移民潮出现在2003年。前往埃塞的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华人，仍以河北人居多，不过江苏人和浙江人有后来居上的趋势。

       近年来，几乎每天都可看到黄皮肤黑头发的小伙子带着一脸的兴奋和期待之情，两手提着许多行李，三五成群地出现在亚的斯亚贝巴机场，有的忙着研究如何填写入境卡，有的则到处询问办理落地签证的所在。

       埃塞十分欢迎华人的到来，中国人一般仅需15分钟就可以从埃塞驻华大使馆取得签证。此外，到埃塞来的中国人也可在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办理落地签证。

据官方统计，2007年中埃双边贸易总额已高达约5亿美元，而这一数字还在继续增长当中。近3年来，埃塞经济高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2009年11月，《经济学家》杂志在其网站发布的文章，预计埃塞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将达7%，经济增速将位列卡塔尔、中国、刚果（布）和土库曼斯坦之后，排名全球第五。报告还预计，如果埃塞能成功实现其预计的经济增长，将有望超过肯尼亚成为东非地区第一大经济体。

       目前在埃塞的华人一共有6万余人，大部分是中资公司派驻人员，从事建筑、电信等工程。少部分为个体华商，主要在当地从事贸易和餐饮业。拥有8000多万人口的埃塞是继尼日利亚之后的非洲第二人口大国。对许多人来说，这个经济迅速增长、市场不断扩大的国家孕育着无限的商机。

       个体华商们主要聚集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长居的有1000多人。由于埃塞政府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外国商人只能做进口和批发，零售业保留给当地人，故在埃塞打拼的个体华商并不是特别多。

华人的经济实力还是集中在建筑业方面，涉足建筑业的都是一些比较具有规模的中资集团公司，它们都拥有雄厚的财力和法律顾问团，所以面对的问题就相对地少了很多，脚步也站得较稳。当然，华人在当地取得成功，主要的秘诀还是勤劳以及拥有技术和资金的优势。

       在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里，建筑业大有作为，处处可见新兴工程。从事建筑行业的华人估计多达5万人左右。在2008年刚成立的埃塞中国商会中，中国的承包商、建筑工程和水利水电建设公司占了理事会的绝大多数，其中中国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的程骞先生更被推选为会长。

       埃塞中国商会的成立宗旨是为了加强华商们在埃塞俄比亚的向心力，促进各同行之间的合作以及协调彼此之间的竞争。商会也代表华商与当地政府及社会各界接触和交流，同时，商会也扮演着中国与埃塞的外交和经济桥梁的角色。

       除了中国商会，当地还有4到5个华人社团，都是以地缘和业缘划分，如承包商会和两湖商会。这些华人团体加强了华人之间的凝聚力，同时排解了不少因利益冲突而引起的纷争。

       此外，在埃塞从事农业和餐饮业的华人也大有人在。农业方面，有几个华人农商在当地种菜畜牧，给当地的华人提供华人爱吃的小白菜、芥兰等。他们带来的新品种丰富了华人的菜篮子，也让当地人有了更多的食物选择。

       中餐馆是最能凸显中华印记的地方，大红的灯笼，飞檐画栋。在亚的斯亚贝巴大约有十多家中餐馆，较著名的有天府酒家、天天酒店、长城餐厅、唐人街食府等，北方菜、粤菜、川菜在这里都可以品尝得到。

       其中一家名为紫禁城的中餐厅，一进大门，只见眼前一片红彤彤，除了装潢布置以红色为主，黑人女服务员也都是一身艳红色的中国旗袍。有趣的是，据说她们对这一份工作感到满意的主要原因，就是喜欢上了这一套“制服”。紫禁城也是埃塞首家经营中式烧烤和火锅的中餐馆，口味正宗地道，是当地华人聚餐的首选餐馆之一。

当地人也常光临中餐馆，尤其是高档中餐馆更是黑人满堂，能在中餐馆用餐，似乎是他们的一种身份象征。和许多非洲国家的中餐馆相比，埃塞中餐馆的消费实在不算太高，所以并不会让当地华人“望而生畏”。

       有时候华人吃腻了中餐，换换口味吃“当地餐”，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一般华人都不会排斥当地的食物，有一道叫英吉拉的当地主食深受华人喜爱。它是由一种当地叫做画眉草的植物发酵制作而成，味道略带酸味，当地人通常都用洋葱、番茄和炒牛肉拌着吃，一般也会配上两个烤面包。

       中埃之间的交流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从2005年开始，每一年都会有十多至数十名青年志愿者从中国远赴埃塞来进行无偿服务，领域涉及中文教育、医疗卫生、信息技术等方面，为期两年。

       两年前加入这个项目，和埃塞有过一段渊源的穆小姐说：“我喜欢这里的清新空气和朴素民风，还有好香好香的咖啡以及有趣的民族舞蹈。”

辽阔的埃塞风景优美，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名山大川、碧空原野，这些是继咖啡和舞蹈之后，最吸引华人之处。华人分享说，每有空闲假日，便相邀一些朋友，开着吉普车到亚的斯亚贝巴的郊外观光游览，在天涯的一角探幽，感受大自然的静谧，领略这“非洲屋脊”的高原风情。

       不少人也会越境而游，有的北上埃及寻访古老而宏伟的金字塔；有的则南下肯尼亚，在茫茫大草原上与万兽共舞。

       大街上的军人荷枪实弹，会让许多人主观地认为埃塞治安不靖，其实那不过是军政府对当地人民实行的高压统治，与外国人没有太多的关系。当地华人说：“比起非洲的其他一些国家，这里的治安算是很好的了。”

       相对于安全问题，华人更关心的是卫生和健康问题。当地人的卫生观念不强，处处可见垃圾满地，毒蚊丛生，华人时刻面临各种疾病尤其是疟疾的威胁。加上这里医疗水平不高，一旦染上了重疾将会是很麻烦的事，所以很多华人都携带药物前往埃塞，有备无患。

       埃塞水质欠佳，也是华人在生活上遇到的一道难题。一名中国援埃志愿者表示：“好在工厂的食堂里有单独的管道输送饮用水，每次去那里吃饭，都得拎一个大矿泉水瓶，用完餐后再顺便接水带回住处。”

 埃塞俄比亚民风淳朴，当地人朴实勤劳，对华人亦热情友善。他们对中国近二三十年来的快速发展很是钦佩，对中国文化感到神秘而好奇。无论在何处，看见华人都会主动打招呼问好。有一些曾看过中国武打片的黑人小男孩每当看到华人，都会好奇地打听对方会不会“Chinese Kung Fu”（中国功夫），有时候还比起“单挑”的手势呢。

       在语言学习上，当地人也非常崇拜华人。一般华人到埃塞，在一至两年时间里便能操得一口流利的阿姆哈拉语。掌握了当地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上便无往不利，买东西、用餐、和当地人交流都如鱼得水。

       埃塞人也在努力学习汉语，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大量华人涌入埃塞，对外汉语学习中心在当地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学汉语已是目前风靡当地的一股潮流，在路边遇到会用汉语向华人问好的黑人一点也不奇怪。

       华人和当地人通婚也有了先例，而且还衍生混血的第二代，但这种案例非常稀少，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还是彼此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

       由于埃塞不接受外国移民，一般上，华人都是在当地赚了一笔钱后便会返回中国成家立业。

 华人在当地受到尊崇，并不是因为华人的财力雄厚，也非生意做得很大，而是华人为当地所作出的贡献。首先是华人帮助埃塞改善了物资匮乏的问题，华人到来以前，当地人就连扫把也不知为何物。在某种程度上，华人扩大了当地人的视野。

       华人在埃塞投入资金巨大，不但为当地的建设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还为该国人民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让许多人有能力养家糊口，确保三餐温饱。每年更有许多华人志愿者远道而来，在教育、医疗、科技等方面给予援助，改善他们的生活。

       在泰克泽水电站附近有一所名为Tekle Mekerna的小学，连年失修，学生们只能屈就于草棚里上课。此窘境引起了正在临近施工的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职工的注意，纷纷慷慨为Tekle Mekerna小学捐资扩建校舍，同时还为学生添购文教用品。

       新校舍落成以后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学校和当地居民为了表示谢意，把“中国水电四局捐资扩建”十个大字印刻在了新校舍的门楣上。此外，镌刻着“友谊长存”，并分别用英语和阿姆哈拉语作注释的一幅十平方公尺的影壁也矗立在校园内，成为中埃两国之间一段佳话。

相对于其他非洲国家，位于东非的埃塞俄比亚显得更加贫穷和落后，但也意味着这八千万人口的大国留给华人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埃塞政局总体稳定，资源丰富，近年来经济持续增长，随着它的进一步开放，华人将在农业、矿业、木材业等领域大展身手，可预期也。这一来，华人在埃塞的经济实力将倍增，中埃的友谊将会万古长青。

 苏丹共和国位于非洲东北部，其领土是非洲53个国家中最辽阔的一个，北部覆盖着浩瀚无垠的沙漠，南部却是片片青翠的茂盛丛林。这里全年万里晴空，风轻云淡；白天阳光直射，晚间却有着深秋的清凉。苏丹最炎热时，地面气温甚至可以上升至摄氏70多度，且长年干旱，故素有“世界火炉”之称。

       这片土地蕴藏着大量的石油，以及采之不尽的各种矿物。然而，这些丰富的天然资源并没有为苏丹人民带来幸福美好的生活，反而带来战火连天，使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工农业落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苏丹还一度被世界经济组织列为最落后贫穷的国家。

       一直到2004年，战火逐渐熄灭。苏丹政府和南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反政府武装组织于2005年1月9日在肯尼亚内罗毕（Nairobi）签署《全面和平协议》，结束了长达22年之久的内战。

       自此，苏丹从世界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名单中除名，提升为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引起全球投资者的注目，纷纷注资开拓这一片生机勃勃的处女地。

       战后的苏丹百废待兴，政局基本稳定。就算是一个这样落后贫困的国家，只要有商机出现，世界各地的华人便纷至沓来。

 在18世纪以前，中国与苏丹这两个国家可说是毫无半点关联，直至19世纪，英法联军统帅查尔斯·乔治·戈登（General Charles George Gordon）在1860年率军火烧圆明园，后又出任苏丹总督，两国之间才开始有了一些交集。

       自1874年至1880年，查尔斯总督统治了苏丹长达6年，并于1885年被苏丹的民族英雄马赫迪（Mahdi）所击毙。马赫迪此举也算是为中国报了一箭之仇。2004年，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李肇星访问苏丹期间，就向苏丹总统巴希尔（Omar al-Bashi）表示：“中国人民欠苏丹人民一个人情。”

       从1959年2月中苏两国建交以来，中国不断地给予苏丹支持和援助，两国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合作关系，为现代华人移民苏丹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决定出外闯荡的华人开始选择登陆苏丹，到这个具有浓郁阿拉伯色彩的国度追逐自己的梦想。起初，移民人数较少，直至1990年代中期，才正式出现了第一波的移民潮。当时，苏丹的石油经济备受看好，又恰巧碰上南北内战出现了和解曙光，勃勃的商机让各地的华人蠢蠢欲动。

       1996年，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率先进军苏丹，许许多多大小企业即接踵而来，藉此开展各自的事业。此外，个体淘金客也闻风而动，一波接着一波地涌往这片充满财富的土地。

 目前在苏丹生活的华人，以中国大陆人居多。他们来自中国各个省份，主要通过亲友引介或单位派驻而来到苏丹。来自大陆以外的华人则屈指可数，他们不是生意人，便是联合国驻苏丹的职员。

       到苏丹的华人，都抱着“淘金梦”和“到国外见识”的心态，真正愿意落地生根的近乎零。至今已加入苏丹国籍的华人，还不超过5人。

       建立起石油工业和建筑业是华人对苏丹最大的贡献。1999年，中国在穆格莱德盆地（Muglad Basin）开发苏丹第一座油田，占地4.9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第四大油田，年产原油1000万吨。当年，苏丹就从石油工业中获得6.8亿美元的收入，从石油进口国摇身变成石油输出国。

       坐落在青尼罗河南岸的中苏友谊厅，是苏丹家喻户晓的中国援建项目，也是召开重大会议、举办展览、进行各种庆祝活动的场所。每当经过这里，中国人脸上便会流露出一种莫名的自豪感。

       无论走到哪里，苏丹华人还会很得意、如数家珍地告诉你：“这青尼罗河曼希尔大桥是中国公司设计承建；那一条是我们中国承建的大道，直达恩图曼，缓解了当地交通阻塞的恶况；前方那一栋也是我们中国承建的大楼……”

       不管在首都喀土穆市中心或是郊外，都有华人留下的足迹，而位于喀土穆以北约70公里的炼油厂，更被誉为“中苏的结晶”。2000年，中国副总理吴邦国参观炼油厂时，有感而发，挥毫写下了“中苏友谊丰碑”几个大字。

       现在，从机场到建筑基地或油田，都可以看到许多从中国不远千里而来的“工兵”。语言，是他们跨进苏丹国门的第一道门槛，许多中国民工一抵达苏丹机场入境处，便因不懂得填写阿拉伯语和英语的入境卡而开始抓脑，急切地四处观望，盼能找到年轻一辈的华人帮忙。

       而今，苏丹华人人口已经超过了5万人，分散在苏丹的各个角落。民营企业家有数百人，主要来自浙江、山东、江苏、河北、北京、上海等地，涉足铁路、公路、房地产、建筑、医药、汽车制造等领域。任何可以想到的行业，都能看到华人的身影。

 苏丹贫困落后，却是青年人创业的好地方。在这里，只要吃得起苦，耐得住寂寞，就算成功了一半。年轻的华人拥有忍受酷热天气和狂厉沙尘暴的能耐，一颗无惧的创业心更是推动着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创出一番成就。但最重要的，还是他们愿意融入当地社会，积极学习当地的文化礼仪和语言。

       1995年，武汉民营企业家李利红带了20万美元独闯苏丹打天下，仅用了3年的时间，便创出资产过亿的星达公司。星达公司承包了整条尼罗河的航运，让中国船只得以航行在这条黄金道上，同时也疏解了苏丹人民的交通问题。

       喀土穆利雅得区的利达数码影像公司老板李喜阳同样是30出头，3年前经朋友介绍到苏丹创业。他开始从老本行——开照相馆做起。日子久了，他逐渐摸熟了当地的市场，探查出其他生意门路来。现在，除了冲洗照片之外，他还开起电话吧，同时兼营印刷、电脑维修、软件安装等服务，在苏丹华人圈里颇有名望。

 他说：“每个行业都有一个周期，尤其是在苏丹。这里原有的行业不多，你若做得好马上就有其他人跟着做，所以要不断地根据市场做调整，寻求转型或其他出路，确保有新的业务补充进来。”

       来自中国苏州的唐甜甜曾周游非洲列国，她说：“苏丹人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和其他国家的黑人不一样。苏丹的黑人每看到华人便会兴奋地大呼‘Chinese！Chinese！’(华人！华人！）就算坐在公共汽车上，苏丹人也会把头伸出布篷，挥着手，友好地和华人打招呼。”

       她发觉当地人对中华文化深感兴趣，于是萌起在苏丹传承中华文化的念头。中文系毕业的她向家里借了十万美元，在喀土穆开办“绿湾中文培训中心”，校名灵感取自储光羲《钓鱼湾》中意境优雅非凡的“垂钓绿湾春”。

       起初雄心壮志的她，怎么也想不到杏坛之路竟如此崎岖。她一脸失望地说：“当初凑热闹来报名的人不少，以黑人居多，但真正来上课的却寥寥无几，而且学生们不认真学习，时常无故缺课。有时候来上课的学生不到5人，现在学生主要还是以各国大使馆官员的子女居多。”尽管跌倒了，她却不愿就此离开苏丹。唐甜甜觉得，在哪里跌倒，就应该在哪里站起来，至少也得把跟家人借的钱给挣回来，所以她现在开始考察当地市场，为自己的商途铺路。

       20多岁的吴欣芝在苏丹一家华人宾馆当了4年公关，便告别了打工生涯，开创自己的事业。她找来志同道合的好友合资开了百川楼，当起老板娘来。百川楼是苏丹典型的综合中餐馆，集餐厅、宾馆、娱乐、休闲于一身，还提供中英阿语翻译以及商贸、旅游等服务。

       餐馆事无论大小，如选铺、装修、招聘等，都由吴欣芝亲手包办。之前几年在苏丹的生活与工作经验，让她在经营餐馆时更驾轻就熟，面对着日益激烈的同行竞争，吴欣芝毫不畏惧：“我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自己的特色，赚钱是其次。”

       除此之外，在苏丹还有不少华人青年当翻译员、厂管，或开网吧及做小商品买卖等，他们为苏丹华社营造出一片生气勃勃的气象。

 苏丹拥有广袤的沃土，贯穿苏丹的尼罗河更为这片土地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源。然而，当地人空守着金饭碗，却不知如何把它变成财富。飞鸿禽业的老板贺扶韵说：“他们白白领受了上帝所赐予的一切，有的人家里有数顷土地，却不愿认真经营，反而给别人打散工，赚取仅够维生的微薄薪水。”这为华人在苏丹大展身手提供了又一个空间。

       苏丹华人开农场的初衷是为华资公司和中餐馆供应蔬菜，但这无形中也为当地市场增添更多可供选择的蔬菜种类。据当地华人说：“当初蘑菇、白菜、芹菜和芥兰等蔬菜被引进的时候，当地人还把它当作奇花异草呢！”如今，就连在苏丹的美国、欧洲和其他国籍的工作人员也深受其益。过去，吃青菜就如吃“山珍海味”，可现在，每天都可以轻易吃到新鲜的青菜了！

       在苏丹生活已有9年的贺扶韵曾涉足多种不同的行业。他表示：“在这里经商一定要选对时机，掌握好市场，还要了解当地人对产品的接受程度，否则将血本无归。现在各行各业都很难经营，主要是竞争太大，而货币和物价不稳也是主因。”

       每天早上，贺扶韵都坐在客厅里，一边品茗，一边凝视着单调乏味的荧幕——画面显示的是他屋外的农场。农场里养了一万多只小鸡，里面装置了闭路电视，贺扶韵就依靠现代科技来监控农场的情况，有话叮嘱便通过对讲机来传达。贺扶韵说：“苏丹天气热，容易中暑，而且现在是多蚊蝇的季节，特别容易感染疟疾，所以我尽量少到外面去。”

疟疾深深地威胁着苏丹华人的身体健康。在工地工作的陈先生说：“来苏丹不到一年就中了两次（疟疾），现在3年了，一共得过5次。渐渐地，好像得了抗体，没再受疟疾干扰了。”

       除了疟疾，这里比较普遍的疾病还有风湿、糖尿病、伤寒等，这和当地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和气候温差有关。中国援苏医疗队队长张医生说：“苏丹的医疗水平较差，人民的卫生意识相对薄弱，所以才百病肆虐。我们的到来，对当地的医疗有着重大的意义，至少提高了当地的卫生水平。”

       这支来自陕西的医疗团队共有36名成员，他们在两年的服务期内，长驻位于恩图曼（Omdurman）的中苏友谊医院，常会到城外偏远的地区义诊，偶尔也举办一些关于健康医疗培训课和讲座会。医疗队里的一名工作人员说：“这里面对最大的问题是设备不足，还有难以适应当地人的工作态度。“

       虽然大家都期待早日回国，但能够为当地病患服务及促进中苏两国的友谊，他们觉得还是非常值得。

 华人对苏丹的医疗贡献不仅于此。除了友谊医院，喀土穆市中心还有华夏医院、天府诊疗所，其它城市如拉巴克（Rabak）、阿特巴拉（Atbara）等也有华人开办的诊所和医院。华人医生就带着翻译员风尘仆仆地远赴各处，忍受着日晒雨淋，默默地为苏丹人作出奉献。

       这些医院都是由河南人开办，他们除了为当地人提供医疗援助，也给当地华人服下“定心丸”，身体不适时可免除语言障碍，寻求自己熟悉的治疗方式。

       华夏医院负责人张有中说：“华人开办的医院，不但使当地人和华人受益，还常有其他周边国家的病人前来求医。”

       华人的付出，苏丹人有目共睹，所以他们对中国人非常友善。上街市买菜，不少当地人看到华人，都会冒出一句“你好”，然后向华人竖起大拇指，表示中国人是好样的。

华人一般觉得，在别人的国家，应该要扮演好自己是外来者的角色，奉公守法，绝不能做出自辱的事情。一些苏丹华人甚至会回馈社会，尽力从各个方面协助当地人改善他们的家园。不过，华人也坦承，在华人人数增多，素质良莠不齐的情况下，的确有些作奸犯科的害群之马。

       新疆电力公司经理刘晓飞说：“在海外，我们的一举一动代表整个中国的形象，所以言行要谨慎。”每次遇到当地人，刘先生都会以笑容来表示友好，并附上一句“assalamu' alaikum”，意即“主赐平安”。他说：“当地人非常友善，我常被他们的热情感动，我这样做也算是投桃报李。在马路上，他们常热心让道，这也让我养成了礼让的好习惯。”

       华人的勤奋让黑人感到不可思议。有的华人日作夜劳，假期照样上班，似乎从来不需要歇息，黑人常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说：“华人怎么比工厂里的机器还能干？”华人的到来，确实给当地黑人带来了不少正面的影响。在华人的督促下，黑人工作起来积极了不少；有的华人还强制黑人员工们把工资存起来，养成储蓄的习惯。

       华人也不是不懂得娱乐消遣，只是当地着实没什么休闲的地方。这里所谓“全国最大商场”，其实只不过是一座两层楼高的商场，里面除了有一家中等规模的超市和十来间商店，就只有一间电影院和保龄球场。

       偶尔，电影院会播放成龙、李连杰等华人武打巨星的影片，给孤寂的苏丹华人带来无限的亲切和归属感。华人的功夫影片对当地影响极深，有时黑人看到华人就会开玩笑地摆出中国武术的姿势，直呼：“嘿！Bruce Lee(李小龙）！Jacky Chan（成龙）！”

       苏丹华人的欢乐时光落在每周的星期五。当天为法定假日，穆斯林都会到清真寺做礼拜；当地华人也入乡随俗，一早便出门到朋友家串门子，闲聊过去一周的生活。谈笑声中，便开桌打麻将或玩扑克牌至傍晚，再由主人家里弄几道佳肴或到中餐馆聚餐畅饮。

聊天、打麻将、聚餐已成了许多华人每周五例行的“三部曲”。在周六，华人一般会安分地留在家里，上网、阅读，养精蓄锐以应付来临的一周。

       在这个伊斯兰国度里，酒是一大禁品，售价特高，所以华人有时就算愁肠满腹，也舍不得买酒消愁。一名华人开玩笑说：“在这个国家里，吸水烟是我唯一的不良嗜好。”

       酒，除了可以通过不法途径获得以外，有的人家里还自酿葡萄酒。然而，市面上没有酒的供应，酒吧、迪斯科、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就自然不存在，这也是苏丹生活苦闷的主要因素。

       有些华人却以正面的态度去看待：“没有了这一些场所，治安就不会坏到哪里去，我们也能够专心工作。”

       苏丹禁赌，搜遍全国也看不到半间赌场。但如果因为这样而认为苏丹华人不赌博就未免太天真了。“虽然这里百般禁忌，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私底下还是可以赌钱的，但都是小赌怡情，没有人会沉迷其中。”一个中国人得意地说。

       其实，很多当地官员根本不知道麻将为何物，就算在他面前光明正大地打麻将，他们也不知就里，还以为华人在玩积木呢！

       非洲餐饮和中餐概念不同，中国公司一般会聘请中国厨师来解决华人的三餐。由于食材有限，中餐的烹调方式以简单为主。早上有油条稀饭或馒头绿豆汤；午晚两餐有时两菜一汤，有时干脆一大锅酸菜面便解决了。身在他乡还能吃到家乡菜肴，当地华人都不会嫌伙食不好。

       若要吃得更好一些，苏丹各大城市不乏中餐馆，单在喀土穆就有十家。中餐馆门口都会悬挂着大红灯笼，非常容易辨认。当地伊斯兰教徒对中国食物有所顾忌，因此鲜少光顾。在客源不足的情况下，苏丹中餐馆的规模一般都不大，主要做华人应酬、聚餐的生意。

       中餐馆的特色是餐馆附属在宾馆之内，纯粹的餐馆在这里是很罕见的。除了住宿和饮食，这一类宾馆有的还提供美容美发、按摩保健、卡拉OK、代订机票、代办签证等服务。作为华人的聚集地点，宾馆也为他们提供一系列的后勤服务。

       一般上，中资企业在喀土穆都会设立一个总部。所谓总部，通常是企业以一个月数千美元租用当地人的独立式房子，里面分隔成十多间小房，以作办公室、睡房、客房等之用，规模大的还有桌球、乒乓球桌、健身房、游泳池等设施。

       对那些长期在苏丹各地奔波的游子来说，公司总部就是他们的驿站，也是他们添购日常用品之处。

菊黄色的正规的士在苏丹比比皆是，但大部分管理阶层的华人都拥有自己的汽车或公司提供的车子。在苏丹，拥有一张当地驾照一般需要700苏丹磅。由于华人大多涉足工程和石油领域，经常往返公司与工地，所以都会选择以四轮驱动车代步。

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和凤凰卫视是苏丹华人餐桌上的另外一道“菜肴”。一边用餐，一边收看中国电视节目已成了苏丹华人的习惯。

       积累了一定的读者群，并具备更成熟的出版条件后，第一家中文媒体——《华人商报》于2008年9月9日应运而生。其创刊号虽然只有区区的4页，但对于身在海外的华人来说，这等同于久旱逢甘霖的恩赐。彩版印刷的《华人商报》为苏丹华人提供当地的最新消息，并且提供各类生活资讯，彻底告别“无知”的年代。

       在日新月异的时代里，人们多是通过网际网络与外界联系。在苏丹，穿着朴素的中年华人劳工，不懂外语，也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但这不表示他们思想落伍。相反地，他们三两人中便有一人手提着笔记型电脑，腼腆地告诉你：“没办法，这里生活苦闷，唯有靠这东西上上网、打打游戏来消磨时间了。”

中年人已是这样，年轻一辈更是不遑多让。枯闷的生活并没有把苏丹那一班活力无穷的小伙子变得暮气沉沉，他们在空余时间写博客，倾吐自己在苏丹的心声；使用聊天工具QQ上网交友，寻找海外知音。在非洲华人群体中，苏丹华人的博客可说赫赫有名。

       以上种种，也无形中加强了华社的凝聚力。许多同住在一个城市数年而素未谋面的人，却透过网际网络变成好友；或某一日在现实中相见，互报网名后才发觉原来是老相识，彼此不禁捧腹大笑。

       “苏丹群侠录”是苏丹QQ群中最有名望的一个沟通平台，要打听当地的小道消息，加入该网络社群绝对是最佳途径。群侠录的影响不断扩大，几位管理员还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包括苏丹“群侠杯”乒乓球挑战赛、“相约09”苏丹群侠录见面会等，以丰富苏丹华人的业余生活。

       正是因为苏丹QQ群中有着一组活跃分子每天在网上“成群结党”，让当地华人得以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他乡相识，大家格外珍惜彼此的友谊，不时相约出来打打球、聚聚餐，以排遣生活中的寂寞与乡愁。

       每逢佳节，除了大使馆举办的新春晚会、中秋晚会等，苏丹各个华人圈子也会庆祝一番。就连当地的穆斯林传统节日——宰牲节，他们也不错过，只要花上几十美元，就能买到一只山羊，晚上邀请好友知己到家中一起烤羊肉，普庆异族佳节，让彼此的友谊获得提升。

       随着华人人口激增，华人从事的行业圈内难免会出现竞争的情况，因此在中国驻苏丹大使馆的建议下，各行各业的协会纷纷成立，如苏丹中资建筑、铁路、路桥企业协会、苏丹华人农业协会、苏丹中国企业商会等。成立宗旨是增进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统一价格，维持公平与良性的竞争，以及促进苏丹各行业的发展。

中资的阳光国际饭店矗立在喀土穆市中心，成了当地的地标。

尽管在苏丹的历史不长，华人在苏丹的文化领域却已有一番建树。

       苏丹空旷的气息以及质朴的生活形态，深深地把中国石油工程建设集团公司（CPECC）的职员苏宁给迷住了。在苏丹的7个年头里，苏宁经常到画廊以及艺术广场汲取当地的艺术养分，并认识了苏丹籍画家阿菲菲（Afifi）。在阿菲菲的熏陶以及指导之下，苏宁在工作之余，也创作了不少速写作品，并在作品中倾注了他对苏丹生活的热爱。2005年12月，他还出版了华人在苏丹的第一本画册——《我眼中的苏丹》（Sudan In My Eyes）。

 在画册中的近百幅作品，均蕴含着作者对苏丹生活的种种感受。通过细腻的心思，还有中国画特殊的创作手法，他生动地以线条和颜色记录了此地曾经令他心仪的每一幕场景。

       2006年，苏宁成了第一位在苏丹Rashid Diab艺术中心举办个人画展的华人；隔年，他在喀土穆Papa Coster画廊办画展。苏丹文化和青年部部长穆罕默德·再尼为开幕仪式剪彩时，盛赞画展等于是中苏文化交流的新篇章。其艺术成就也受到当地知名画家、甚至当地高官、各国大使馆官员以及诗人的肯定。

       在2007年，《我眼中的苏丹》被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所收藏，对此，苏丹华人无不引以为豪。同年4月，苏宁的这本画册还被苏丹总统府当作礼物赠送给出访苏丹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此外，该画册也被苏丹红海州预定为宣传萨瓦金岛（Suakin）旅游业之用。

       除了作画，苏宁也于2008年在中国出版了两部以苏丹历史文化为题材的中文杂文集——《黑》和《我和萨瓦金岛在一起》。

 这些年来，华人与苏丹建立起双赢的合作关系。苏丹为华人提供创业、发展的机会，华人则为当地发展作出许多贡献。

       虽然只是过客，许多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日子的华人都会爱上这里的平静和闲适，有的人工作期满回国后还会不时想念这里，盼望有朝一日能够重返这片土地。

       「这里只要不再发生内战，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发展还是充满信心的。」这是苏丹华人的心声。

尼罗河在一片浩瀚的沙漠中蜿蜒流淌，世世代代滋养着流域两岸的子民，也孕育出灿烂的古埃及文明。这片神奇的土地，横跨亚非两洲，几千年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英国人曾先后入主斯土，借此实现他们征服世界的野心。

       古埃及人创造了金字塔奇迹，希腊人建筑了亚历山大港，阿拉伯人改变了这里的宗教信仰。如今，埃及带着历史的尘埃，每天向纷至沓来的各国游客敞开热情的怀抱。

       然而，这种胸襟仅限于暂居的游客和商人，对热情投奔的移民却立下绊脚的门槛；像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一样，移民埃及十分困难。尽管如此，还是有一批为数不少的华人，在这个相对开放的阿拉伯国家，找到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均经历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并且相互辉映。两者昔日的繁华，总不禁让人揣测，古埃及人与华人是否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曾经在历史的长河中相遇过？此一猜想于史料中得到了证实。根据《史记·大宛传》记载，早在西汉时期就有使臣到达黎轩，有学者认为，黎轩便是现今埃及的亚历山大港。

       最早移居到埃及的华人，其抵达年份以及姓氏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根据当地老华人说，他们是前往麦加朝圣的回族，因为没有盘川返回家乡而滞留在阿拉伯地区，有一部分人便辗转来到了埃及。

       历史上，一些中国西部的商人也曾经到过埃及。他们以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茶叶来换取埃及的香料、药材和珠宝，然后带回中国变卖。长年累月的往返之后，一些人对这个国家培养出感情来，遂选择在当地定居。

       20世纪初，有一些华人到埃及来留学，以探求伊斯兰学理。抗日战争期间，埃及的华人留学生也非常积极地替中国寻求阿拉伯国家的支援。当时，华人自行设立了旅埃同乡会，并为中国政府第一任驻埃及外交使节举行欢迎酒会，出席酒会的华人至少有60余人。

* *马氏家族来到埃及，在开罗郊外的Maadi地区买了住所安身。没想到半个世纪后，Maadi逐渐发展成开罗的新兴高级住宅区，华人与来自各国的工作人员纷纷迁入。如今Maadi已经成为开罗华人最密集的地区，街上随处可见华人的身影和商铺。*

       数十年过去了，至今还能忆起往日时光的华人已经寥寥无几。第二代华裔阎瑞祥和马承援一家便是几个为数不多的历史见证人。年逾半百的阎瑞祥仍记得父辈的故事，他说，1930年代，他的父亲阎永庆随姐夫从山东登上了一艘自己也不知开往何方的货船，决心离开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

       19岁时，在命运的驱使下，他来到埃及的苏伊士港口。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移民一样，初来乍到的他金钱不足、语言不通、环境不适。当时，埃及正处于政治混乱期，阎永庆一时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顿。随着朋友增多，再凭着华人坚韧、勤奋的个性，他做起了古董生意，之后又与友人合作经营电影院，逐渐在埃及闯出了一片天地。

       当时，来自希腊、意大利、法国、英国各地的人，早已遍布整个埃及，因此像阎永庆这样做生意的华人，不论卖古董，还是卖桌布，在埃及人眼中并不算稀奇。

       1949年，本想在沙特阿拉伯落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马步芳家族，因无法忍受沙漠的炎热，于是开着飞机来到埃及。当年才12岁的马承援，跟随爷爷、父亲及其余十来个家庭，在埃及生活下来。相对而言，埃及气候宜人、资源丰富，而且一埃镑可以兑换3美元，普通百姓每月收入3毛钱，就足以应付生活开销。马氏家族的积蓄还算充裕，但却适应不了当地的饮食习惯。

       马承援回忆道：“那时候有钱也吃不到想吃的东西，手上拿着钱，却不知道买什么。虽然我们也是穆斯林，但中国西北的食物和这里的很不一样，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自己在家里做面食，磨豆腐吃。”军旅出身的马家人，不会做生意，又没有其他技能，坐吃山空也不是长久之计。埃及与新中国建交后，大部分马氏家庭成员选择迁移到沙特，仅马承援一家留下，靠经营杂货店谋生。

       由于埃及的移民限制极为严格，阎氏和马氏家族虽然已在当地生活了几十年，却始终无法入籍。他们目前仍持着中国护照，在就业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大部分老华侨的后代，都已离开埃及到别国发展。

       在马家之后，数十年间鲜有华人再进入埃及。直至1980年代，来此定居的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台湾的商人才渐渐多了起来，另有一些华人则是因为参与中国援助埃及的建设工程项目而留驻埃及。但是若和其他国家相比，华人移民人口还是很少。

       根据统计，在1999年，埃及只有300名华人；到了2000年以后，来自浙江、东北以及福建的新移民才通过投资或旅游的渠道大批进入埃及，并在此设立公司，甚至办工厂，在贸易的领域大展拳脚。

 埃及华人把这里称作非洲的天堂，无论是气候、语言、文化、人情味、赚钱良机，每个人都有让自己留下的理由。

       据官方统计，埃及目前有5000名华人，但实际人口远远超过这数字。保守估计，埃及华人该有一万人左右，其中与异族通婚的华人和真正融入当地的老华侨只有50多人。

       埃及华人的人口不算多，主要来自中港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大多聚集在开罗，从事着各式各样的生意。也有不畏辛苦的华商，深入穷乡僻壤寻找商机。

       在埃及，华人涉足广泛，包括石材、贸易、制造业、石油、餐饮、中医、语言、旅游等领域。其中以背着包袱、挨家挨户卖衣服的“走家”华人占多数，而在农村展棚内设摊卖货的青田、温州华商，也有一定的数量。除了这两群华人的生活颇为辛苦外，从事其他行业的华人在埃及的生活还是相当舒适的，尤其是中资公司的员工和以福建人居多的大理石贸易商。

       埃及贵为旅游大国，但与之相关的中餐厅和华人旅行社的发展却不尽理想。从1965年第一家中餐厅——北京餐厅开业至今，全埃及的中餐厅也不过十来家，而主要接待的顾客还是华人。旅游业的发展空间虽大，但由于埃及政府规定华人不能独自经营旅行社，且不能当导游，因此目前华人旅行社仅有六七家，华人从业者也只有几十人而已。

       埃及政府实行经济保护政策，保护国内的纺织业。因此，有实力的华商干脆在埃及工业区内开设服装加工厂，为衣服打上“埃及制造”的标签，再内销埃及或出口到欧美市场。

       华人认为埃及就像1980年代的中国，处处充满商机。如今来到埃及，就是埃及的客人，凡事都得按照埃及的规则过生活、做生意。如果每天沉浸在对埃及的抱怨和排斥中，不去欣赏它的好，那么埃及也不会给予相应的回报。

       了解了埃及，融入了埃及，华人才发觉，看似文化差异那么大、立足那么难的国家，原来可以开工厂、能做石材贸易；只要不怕辛苦，它的市场其实商机处处。华人愈发感到埃及的魅力，呆上几年，便不愿离开了。

金字塔不但是埃及最重要的文化象征，也带来了巨大的旅游财富。用以建筑金字塔的千斤巨石，从古至今取之不尽。也正是这些曾无人问津的石材，让华人在埃及开拓出一条全新的创业之路。

       在上万埃及华人中，从事石材行业的仅仅三五百人，但却是收入、消费能力较高的一群，在当地华人社会中也较为活跃。由于他们为埃及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所以当地社会对石材商人颇为尊重，“爱吃、爱玩、能赚钱”，是一般人对他们的评价。

       一贯把宗教、政治摆中间，经济放旁边的埃及人，守着几千年的天然财富，直到1982年才设立第一家石材工厂。1990年代中期，埃及人才把眼光投向中国，极度热情地邀请中国人来埃及买货。回忆起那段做“皇帝”的日子，石材华商们无不怀念：“他们三番五次地邀请，买机票、请住埃及最好的酒店、陪旅游、请吃饭，最后才上山看石头，即使不买，埃及人也毫无怨言。”

       广东华人最先进入这行，之后福建水头镇的华人也来了。一般上，两三个年纪不大的青年，带着几万美元，请上一个翻译，就可以去产石材的山里和埃及人谈生意，看中了，当场就买，然后送到海关，交给特定的船务公司帮忙运回中国。石材的利润每年可以超过十万美元。

态度好、价格低、利润高，这样的好事让商业嗅觉灵敏的华人，纷纷闻风而至，2003年达到巅峰。华人与埃及人的办事风格本来就有天壤之别，永远不着急的埃及人，谈生意时，不是迟到，就是天南地北地喝茶跑题，一单生意往往要拖上一两个月，而华商却天天面对来自公司总部的巨大压力。压力导致华人之间的恶性竞争，人人都想靠抬高价格快速拿货，结果价格越抬越高，最后演变成疯狂抢货。

       华人的强劲购买力，把本是一潭死水的埃及石材业一下子搅活了。2006年，埃及人开始做起了“皇帝”，华人从主动变为被动。

       如今，华商们仍须“求着埃及人拿货”，但上百家华人石材加工厂生意红火，让他们觉得所做的一切都很值得。在华人聚集的Maadi区旁，就是埃及开罗石材工业区，它的阿拉伯文名字直译是“蛇之家”，寓意为富裕。在这片饱含财富的沙漠地区，有着数百家石材加工厂，工厂24小时运作，无论何时，这里总是挤满装着大理石、花岗岩的巨型卡车。沙漠的风沙与切割、打磨石头的泥浆混在一起，置身其中，仿佛每个毛孔都塞满了尘土。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几乎没有华人女性从事这一行，即使是一些石材华商的太太们，也不愿踏足半步。而在这里工作的华人男性却不在意，因为他们所付出的辛劳，得到应有的回报。在这里，一名华人技工，每月扣除吃住，净收入可达2000美元，所以这一点辛苦，对他们来说并不算什么。

 尽管华人当初为着不同的原因而来到埃及，但对这里种种的艰苦状况都作足准备。

       在这当中，不少人有过在别国闯荡的经历，冒险精神十足。像50多岁的张女士，退休后曾在瑞典、乌干达独居一段不短的时间，之后又在埃及生活了4年。她说，埃及的生活并不苦，反而很有劲头。

       也许正是这种乐观、闯劲的性格，才让这群旅埃华人当初决定来到这个条件欠佳的国家。曾在东南亚求学的年轻华商谢光，现在一边经营语言中心，一边学习阿拉伯语。他这样解释自己的选择：“我喜欢闯荡，想有自己的事业。在中国，我的生活很舒适，但太平淡，没有激情。所以我选择一个比较艰苦的环境，希望可以激发自己的潜力。如果在这里都能做出事业来，那在其他国家、在自己的国家更没问题。即使不能成功，至少我在这里奋斗过，流过泪挥过汗，没有虚度年轻的光阴。”

       华人在埃及从事的行业五花八门，其中最为辛苦的要数“走家”的华人。他们从事海外服装贸易，是华人商贩中比较特别的一群，绝大部分来自中国东北，据说人数有数千人。

       每当夜幕降临，这些华人便背起半个人高的背包，开始工作。他们在几个居民小区内，挨家挨户地敲门，兜售服装。埃及人通常很晚才休息，所以“走家”华人都会工作到夜半，有时甚至到凌晨两三点。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大部分都是夫妻搭档，男的背包，女的敲门。他们每天都要敲开几十户人家的门，用计算器打价钱，“不过百，不收工”，即每天最低目标是赚到100埃镑（约20美元）。

       一名来自辽宁抚顺的妇女，只身来到埃及虽不足一年，但从她脸上的皱纹，可以看出这里的风沙与生活留下的痕迹。“虽然我在中国农村的家生活没有多好，但是来到埃及还是不能适应。刚开始时，公共汽车的座位都坐不下去，在外面走累了，路边的长椅也不敢坐，觉得又脏又油。”她的背包硕大而沉重，可其实每天卖不出几件货品。“我把上货的衣服都背上，方便胖瘦选择，多背一件就有多卖一件的可能。”她每月的收入也不过六七百美元，好在埃及消费低，可以攒下积蓄。再者，为了来埃及，她付了不少中介费，不赚回来，怎能轻言回国。

       虽然“走家”总是受到当地人和其他行业华人的歧视，但他们还是执着于“外国钱好赚”的想法。“只要能赚到钱，自己卖些苦力是不怕的，一想到可以供家乡上初中的女儿读书，就高兴了。”“走家”妇女既无奈又欣慰地说。

       在埃及还有几百名华人商贩，把服装带到偏僻农村的流动市场出售，他们把这称为“做展会”。这些多是浙江青田、温州人组成的商贩，他们的谋生方式就是随着展会走，每月交400美元的摊位费。展会一般在一个地方停留两三个月，他们就在附近的村子租上一间房子，凑合着当家住上一段日子。

说是“展会”，其实就是暂时搭在村落中的有篷市场；所谓“家”，也十分简陋，七拼八凑、勉强成为吃饭睡觉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生活。在埃及，房子封顶要收很高的封顶税，因此没有屋顶的房子随处可见。很多房东便用木板作为天花板，以很低的价格租给这些做展会的华人。

       坚韧的浙江华商，极能吃苦，即使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很多人一做就是五六年。他们生活节俭，每年收入两三万美元并不成问题。在他们看来，这种经商模式更自由，投资成本不高，回报还不错，对回到城市里开店，反而不感兴趣。

刚到埃及的华人经常抱怨这里灰尘漫天、气候干燥、交通混乱、习俗保守，但是只要在埃及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华人，都不想离开。他们说，埃及是非洲的天堂。

       埃及有些好，是展示给游客的，像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遗迹，像入夜后尼罗河畔的灯火与喧嚣。而有些好则需要用时间慢慢体会，越久越沁入人心。

       经营制衣厂的江苏华商李静林来埃及9年，至今还没有离开的想法，甚至打算再留上十年。这9年间，他看到一波波找机会的华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选择离开的原因，不是因艰苦而失去坚持的毅力，就是因对埃及的宗教、政策、习俗、生活方式了解不足而萌生去意。

       其实埃及的压力远比其他地区小，生活也较惬意。

       李静林的工厂在塞得港的工业区，虽然远离交通方便的市中心，但是他和厂里的员工相处融洽。他们自己种菜、磨豆腐，工作之余去河边钓鱼、抓螃蟹。“一般的梭子蟹我们不抓，我们只吃上好的毛蟹。”工厂里也不乏乒乓桌、象棋、麻将和卡拉OK等休闲娱乐设施。

一般来说，男性华人都喜欢埃及，女性则嫌它太脏。不过呆久了，很多女性也渐渐爱上这里。穆斯林国家民风保守、自律，因此埃及并不像其他非洲国家那样危险。这里治安良好，鲜有抢劫事件。陈太太在开罗开了8年服装店，经常深夜12点关店、独自回家，从未担惊受怕。埃及冬天温度适宜，夏天虽然稍热，但室内或夜晚时分，还算凉爽。这里的蔬果都不用农药，日照时间又长，“想吃一粒不甜的葡萄都难”。再加上物价廉宜，华人比当地人的收入高出许多，基本的吃、住、行都不是问题，套句他们的话：“生活在这里，想干嘛就干嘛！”

       在埃及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吃到最道地的中餐。这里不乏西式的中餐厅，而埃及首家中餐厅——北京餐厅，就是当地著名的高档混合式中餐馆，早期光顾的多是埃及人或各国游客。随着华人数量增多，华人顾客逐渐成了埃及大部分中餐馆的主要服务对象。无论是东北菜、西北菜，还是湖南菜、广东菜，口味越道地，生意就越好。

       有些开在华人聚集区Maadi的中餐厅，店面不大，气氛犹如自家餐厅，顾客一般都是回头客，刚到的华人，一进门就会被店主认出。如果碰巧店家也在用膳，客人又不多，他们完全可以“客随主便”，有什么吃什么，店主仅象征性收几美元。

       埃及华人这种浓厚的人情味，很大程度是受到埃及人热情、豁达的性格影响。很多华人都曾获得当地人无私的帮助，最常见的就是问路，有些埃及人甚至会亲自带路，不管多远，也不收取任何费用。

       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心境自然开朗。华人美容师艾玲回忆起自己刚开始工作时的情景，至今仍对那些帮过自己的朋友心怀感激。刚到埃及时，不懂阿拉伯语和英语的她，无法与客人沟通，每到讲不清楚的时候，艾玲都会打电话给几位语言较好的华人朋友，请他们通过电话翻译，这些朋友不管当时有多忙，都会放下手头的事，毫无怨言地耐心帮忙。

 金库餐厅的张老板刚从大理石行业转到餐饮业时完全没有经验。在开业前一天的试餐上，一名朋友发现塑料桌布有失饭店的格调，马上打电话给自己的服装厂连夜赶制，并赶了五百公里路，在开业前及时送到餐厅。

       埃及华人间的感情就是这样实在。有的愿意开几百公里的车，只为和朋友吃顿饭。

埃及拥有80%的穆斯林人口，人们的言行举止都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让华人有时感到与之格格不入。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最终还是得入乡随俗。

       和埃及人打交道，这里的华人都曾经历从笑到哭，再到哭笑不得的过程。初到埃及，埃及人善良、热情，让见惯商场险恶的华商感动万分。仿佛有着太多时间的埃及人，最热衷的就是帮忙、聊天、管闲事，看到走在街上的华人，如果个子高，他们会喊“Bruce Lee”（李小龙），如果个子矮，就叫“Jackie Chan”（成龙），再加一句：“来来，我们聊会儿天！”起初，出于礼貌，华人都会热情地回应，怎料这一聊，就没完没了，不管你听不听得懂、应不应声，他们就是叽里咕噜、反反复复地说个不停。“埃及人真不错，就是太罗嗦。”见识过埃及人的“口才”，华人开始对这种热情退避三舍。

       若真正和埃及人做起生意，华人就开始受不了。几乎所有的华商都抱怨过，在埃及做生意太不容易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埃及人不重视信用。当地政府规定，在埃及投资必须有一位埃及的合伙人，但华人遭合伙人欺诈的事情仍时有发生。自此，华人就得到经验——不能过于相信埃及人的承诺。

       迟到也是埃及人的文化，以显示自己的尊贵身份。迟到半小时，在埃及就是准时到达；约好时间，等上几个小时，也是家常便饭。成吉思汗中餐厅的老板娘为了等装修工人来拆一块木板，竟耽误了开业时间，心急如焚：“已经等了几天，还没有来，打电话催，说好时间，可是却不见人影，真是没有办法。”

       慢慢地，华人在埃及学会了不生气。“像他们一样，没心没肺地生活，不也很好。”凡事宽容以待，是华人在埃及最大的收获。

       做展会的华商，每天都要和不理性、变卦快的埃及人斗智斗勇。埃及人买衣服，不管颜色、大小，心血来潮，一下子可以买很多，但也可能5分钟后，就来退货，如果摊主不退，干脆坐在地上，和你死缠到底，反正他们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华人说，这是埃及人的小孩子脾气，要来做生意，就得去包容。

       开餐馆的华人，也会经常碰到隔壁的邻居突然进来，热情地帮你摘菜、剥蒜、聊天，但要是他们看上了什么东西，就会毫不客气地三番五次索取，碍于情面，华人最后都会不情愿地把“礼物”送给这些热情的朋友。“其实这样也好，这里不需担心被偷被抢，谁喜欢什么东西，都会经过你的同意才拿。”展会结束的时候，华人摊主往摊位上罩一层布就走，从不担心有人偷东西。

 时间久了，埃及人的表现，也变成吸引华人留下的理由。“埃及人有很多可爱之处，好人、坏人都不错。”与欺骗过自己的人再合作，在华人之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在埃及却很平常。在这里经营旅行社的柴如帅，一语道出在埃及成功经商的真谛：“语言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文化的接纳，不能用华人固有的思维一意孤行。”在他的眼中，即埃及人再怎么不讲信用，但还是比跟华人做生意容易。“因为华人太精明，什么都计较。”柴先生喜欢埃及同事称呼他为“兄弟”，而不是经理，因为在穆斯林世界里，兄弟之间可以相互信赖和帮助。和埃及同事为华人游客作向导时，他就叫埃及同事的中文名字，如“孙悟空”、“张飞”、“林冲”等，游客容易记，埃及同事自己也喜欢。

       一些华人在埃及所受最大的影响，就是皈依伊斯兰教。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基于通婚不得不选择入教，但也有的服膺于强调自律、真、善的伊斯兰教义。共同的宗教，让他们在穆斯林社会中，得到更多便利。在与埃及人打交道时，当地人会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而非一个来淘金的外来者。

至于原本就是回教徒的华人，到埃及经商，在文化与习俗上会更容易被当地人接纳。来自山东的回族华商王虎，在他的两间大理石加工厂都建了穆斯林的祷告室。“建厂房的时候，我就想到埃及工人需要祷告，而我自己又是穆斯林，为什么不给大家提供一个角落，一起祷告？”每逢斋戒月和宰牲节，工厂也会根据当地习俗休假、宰牛。不过，聪明的华商更加明白，仅以宗教来拉近和当地人的距离作用有限，最重要的还是获得实际的利益，动之以心。只要支付够高的薪水，当地工人都愿意与一个老板一直合作下去。

埃及大部分华人仍属开垦的一代，面对诸多困难，如语言、文化、地方保护主义，冲破每一道隔膜都需要时间。

       这里的华人社团、媒体、宗教组织都还不成熟，不过也有人正基于此，选择扎根埃及，希望在这片处女地上找到惊喜。

       原本在荷兰、捷克做生意的温州商人陈建南8年前到埃及旅游时，看准当地广阔的市场和华社发展上的空白，便毅然带着全家人来到埃及，从事贸易，另辟事业版图。陈建南目前担任旅埃华人联谊会会长，同时也是埃及华人基督教团契会的负责人，而他自己的生意，也发展得颇为顺利。

       旅埃华人联谊会目前有280多名来自五湖四海的会员，其中以浙江人居多；正副会长有20多位，主要涉足船务、鞋业、纺织品、机械配件、大理石加工等领域。成立联谊会的最大目的，是希望能更好地维护埃及华人的合法权益。举凡注册公司、联系生意、寻找合伙人，甚至调解家庭纠纷，联谊会都扮演着大家长的角色，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避免华人受骗上当，浪费无谓的时间和金钱。

       华人基督教团契会，几经停办后，2007年才又重新聚会，坚持至今。七八十名信徒，每逢周末都在陈建南的家中做礼拜、搞聚餐，甚至排练节日演出项目。幸运的是，陈建南的房东是埃及为数不多的基督徒，因此避免了宗教信仰上的矛盾。

埃及华人商业联合会也是较为活跃的华人社团。华人商会聚合了当地60多家华人制造企业，经常举办聚餐等活动。“我们从埃及各地赶过来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友谊、互通信息、共享资源。”

       在这个文化异域里，中文读物并不常见，娱乐又少，华人的精神生活因而显得贫乏。由香港人黎馨馨创办的《中埃友谊——旅埃华人通讯》，让埃及华人得到一丝精神慰藉。杂志虽然只有薄薄几页，但内容精简，每次发刊，其内容总是成为华人茶余饭后的主题，而杂志上的广告，也成为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

* *埃及的中文媒体数量不多，但在中东地区甚具发展潜能。旅埃华人联谊会在2009年4月创办了一本双月刊杂志《埃及华人》，内容涵盖埃及的商业、政策、文化、生活等方面的资讯，共50多页，不但在埃及发行，也面向全中东华人，每期发行量大约3000份。*

       埃及华人第二代的中文教育，可说还未起步。近年来，埃及掀起“学华语”热潮，在旅游旺季，会说华语的导游，收入是英语导游的3倍，但在中国文化中心里，学华语的都是道道地地的埃及人。而华人一般将孩子们送入国际学校，学习阿拉伯语和英语，华语仅作为家庭语言。华人孩子总是能轻而易举地拿下全班第一名，成了埃及小孩争先交友的对象。

对很多华人来说，在埃及拥有一辆车子，并非难事。不过在埃及开车，却是“对心灵的巨大摧残，对精神的巨大压迫”。

       埃及人慢性子，做起事情总是让华人急得挠破头，唯一快的就是开车。在这里，“交通规则等同虚设，驾车者都视若无睹”，让开车一贯守规矩的华人心惊胆颤。

       在埃及的街道上，大家唯恐开得太慢，总是争先恐后地往前挤，不惜磕、碰、刮、蹭、撞。仔细看当地的车，两边的后视镜一般都折起来，完全靠车内加宽的后视镜来观察路况，时刻准备和其他车辆“零距离接触”。在这样的情况下，华人若固守交通规则，不但寸步难行，而且会被当地人狂按喇叭，因此他们只能入乡随俗，和埃及司机一起疯狂赛车。

       对蹭一下，留道刮痕，甚至撞掉后视镜，都不是新鲜事。遇到这样的情况，即使下车理论，也不会有结果，最多只是按按喇叭，表示一下抗议。其实，在马路上要找一辆完好无损的车并不容易，但看着那些带有各种刮蹭、撞击痕迹的汽车挤来挤去，也是一种乐趣。

       逐渐适应了公路上的疯狂，埃及人还是有他们的可爱之处。车子若在路上发生故障，只要招手，肯定有人给予你力所能及的帮助。曾有华人在长途行车中没了汽油，埃及司机从自己的油箱中抽出汽油为他解决燃眉之急。“看到他用嘴把汽油从自己的油箱中吸出来，叫人哭笑不得，却也让我感动不已。”

 华人闯荡埃及，从对环境的不适，到对埃及的又爱又恨，再到彻底地喜欢上这片土地，最后甚至不愿离开。这心情转换的过程，只需短短几年时间。尼罗河的水就是这样神奇，把喜爱它的人留了下来，并赐给他们财富与快乐。